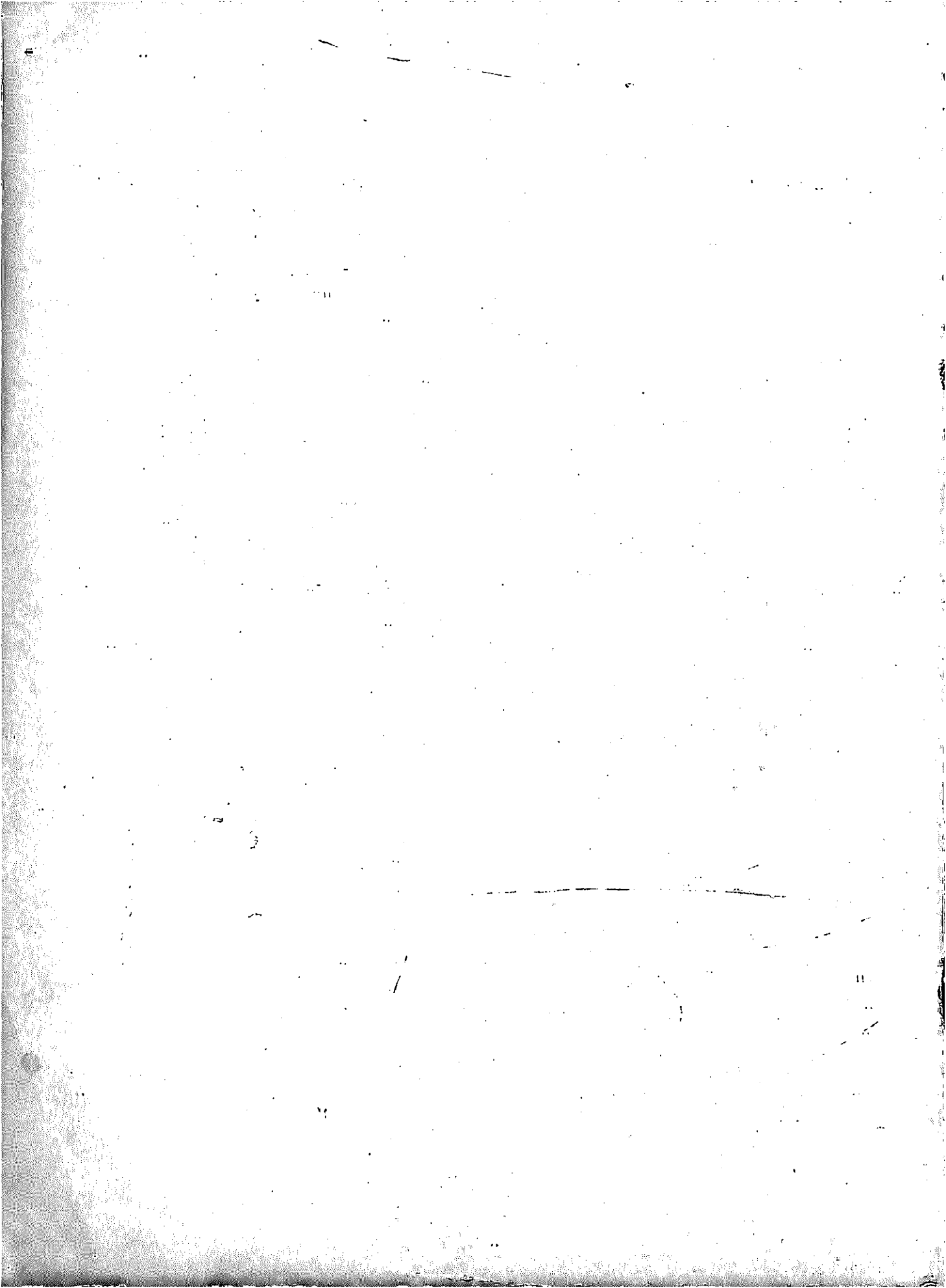


XUEXI YU PIPAN

学习  
与  
批判



杨  
五  
六  
廿  
九



#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 学习与批判

一九七五年第六期 目 录

##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 当理论为群众掌握的时候

——上钢五厂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侧记……本刊通讯员、记者（3）

### 增强党的观念

——学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常学新（12）

在理论学习中加强党员教育……中共上海砂轮厂委员会（15）

漫话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康立（17）

商品自述(二)……景池（22）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续完)……（27）

## 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 忆柯庆施同志二三事 ..... 叶伯乐 (30)
- 读一个旧《通知》 ..... 季昌华 (34)
- “函授”日记摘抄 ..... 复旦大学新闻系 林帆 (37)
- 论“气派” ..... 陆丽芬 (39)
- 份内、份外 ..... 龚青 (41)
- “钱能通神”及其他 ..... 谷卓 (42)
- 小评论 学理论不能等待 ..... 中华造船厂 高志仁 (45)
- 评“吃得开” ..... 求新造船厂 章智明 (47)

## 经济问题研究

- 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专政 ..... 宫效闻 (49)
- 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上)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选载 ..... (52)
- “公事公办”  
——发生在凤城大队的故事 ..... 宋兴峰 (58)

## 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史研究

- 抗战时期的一本革命三字经 ..... 吴乾兑 (62)
- 评黑格尔对孔学的批判 ..... 上海汽轮机厂 郭哲祖 (65)
- 《秦献记》和《秦政记》的写作年代 ..... 沈 濮 (70)
- 关于荀彧的死和他的政治倾向(读者来信)  
..... 南开大学哲学系 73 级工农兵学员 韩 强 (72)

## 人 物 传 记

- 鲁迅传(续二) ..... 石一歌 (75)

◀ 六月十八日出版 ▶

#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 当理论为群众掌握的时候

——上钢五厂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侧记

这两天,在钢铁厂的炼钢车间里,气温急剧上升,炉前捷报频传,夺钢大战热火朝天。人们学习革命理论的热情,也同车间的热气一样高。在上钢五厂,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犹如钢水奔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一浪高一浪地、深入持久地向前发展。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在上钢五厂的干部和群众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当人们把学习革命理论,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任务紧紧联系起来的时候,学习的热情更高了,劲头更足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如饥似渴、逐字逐句地反复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革命导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以及中央报刊上的重要文章。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建立了巨大功绩的工人理论队伍,和工人群众结合在一起,通过宣讲、辅导、调查、展览、办学习班、开讨论会、交流会等多种形式,把全厂学习理论的群众运动步步引向深入。几个月来,厂里举办的各种学习班以及大大小小的学习讨论会、交流会,数以千计。三月中,很多车间在广泛学习讨论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形成了十几个专题,进一步掀起了新的学习高潮。人们按专题认真读书,按专题调查研究,按专题讨论钻研,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把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真正搞清楚。有些小组为了弄清一个问题,常常要学习好几篇文章,讨论好几次,一直讨论到深夜。工人们说: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轻轻松松改变不了面貌,在学习理论问题上,也要有这种精神。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使上钢五厂广大群众进一步认清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学革命理论,做企业主人,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正在成为广大职工的战斗口号。“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上钢五厂学习理论问题的群众运动虽然仅仅是开始,可是,它也已日益显示出巨大的力量。人们普遍反映:通过学习,思想更清楚了,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更高了,人们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改善了,干劲也更足了。干部、群众,团结

战斗,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五月份,这个厂的钢和钢材的产量,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其中电炉钢的月产量还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出现了革命、生产齐飞跃的生动局面。

## 争做有觉悟的人

“要做有觉悟的人。”这是上钢五厂广大干部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得出的一条重要体会。

问题是从关于领导权的学习讨论开始的。

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对于毛主席的这段话,现在应该怎样理解呢?八车间讨论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认为: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讲的,现在情况变化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了。

另一种认为:毛主席的这段话虽然是文化大革命中说的,现在仍然有现实意义,在整个过渡时期,都有现实意义。

两种意见争论了一天,还是相持不下。持前一种意见的同志甚至说:“如果认为这段话仍然适用于现在,不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吗?”

究竟怎样来认识这个问题呢?

八车间的干部和群众,决心首先从理论上弄清这个问题。他们读原著,查资料,认真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论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有些同志还在讨论会上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使大家逐步认识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要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这个基本的一面,又要看到我们的基础还“不稳固”这个存在着问题的一面。这样是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呢?不是。恰恰相反,这正是为了不断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使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更加壮大,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有的同志说:“看到‘空前巩固’,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看到还‘不稳固’,可以明确继续革命的方向。我们应该经常警惕企业的领导权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里,经常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不断巩固。”

为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搞清楚这个问题,他们又联系厂里的实际进行了讨论。在这方面,上钢五厂的干部是有着很多切身体会的。

上钢五厂的干部，特别是车间总支和支部一级的干部，大都出身于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在旧社会里，各有一本血泪账。他们对毛主席、共产党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对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有着强烈的愿望。但是，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只相信赵公元帅，不相信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在办企业的方向、路线上，产生了很多错误。文化大革命以后，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经过批林批孔，广大干部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上，自觉性是大大提高了。但是，有些同志在工作上碰到一些困难时，已经批判过的东西又会冒出来。

十二车间的干部回顾了这样一件事：一九七三年，车间里生产一批国家急需的锋钢。锋钢比碳钢难轧，车间领导怕工人不愿干，搞奖金是不行了，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奖钢的办法：“轧一吨锋钢算十吨产量”。有个班计划一百五十吨，轧了六十五吨锋钢，算完成六百五十吨。结果，车间里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一方面班班超产，一方面国家计划却经常脱期。为了争轧锋钢，上一班和下一班争得面红耳赤。工人们说：“奖钢、奖钢，风格奖光。”批林批孔开始以后，这条制度废除了，代之以交形势、交任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锋钢生产不断上升。这次学习时，车间总支的一位干部很有体会地说：“文化大革命后，物质刺激和管、卡、压这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是冲掉了，自己也受到很大教育，但从思想深处来说，旧的影响还存在。由于没有从理论上真正搞清楚，一有风吹草动，就还有可能跟着错误的东西跑。”有的同志说：“毛主席的这段指示告诉我们，坏人掌权，固然要丧失领导权。好人掌权，路线不正确，也会使无产阶级丧失领导权。因此，我们当干部的，决不能满足于工作上辛辛苦苦，经济上清清楚楚，路线上却糊里糊涂。我们要做有觉悟的人，要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革命理论，努力提高马列主义水平。”

在车间干部对领导权问题讨论得热烈的时候，二车间、八车间的工人群众在班组讨论会上也议论开了。开始，八车间机修工段有的同志说：领导权，领导权，顾名思义，是领导之权。俗话说：“千人打锣，一槌定音”，“厂里工作有组长，国家大事有中央”，和我们群众不“搭界”。也有的说：领导权是印把子，无非就是图章，但我们群众“一章不章”，怎么谈得上掌握领导权呢？这个意见一发表，很多同志不同意，工人理论小组的一位同志讲了文化大革命中车间里发生的一件事：有一次，车间干部准备把一只不用的环形炉拆掉，花二十万元新造一只加热炉。工人同志知道后，认为这不符合多快好省的精神，主张把环形炉加以改造。开始，有的干部对工人说：“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工人说：“不能只听你的，也不能只听我的，谁说得对，就听谁的，谁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就照谁的意见办。”以后，经过几次讨论，统一了认识，干部和工人一起，只花五万元就把这只炉子改造好了。

因为这个同志所讲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讨论会活跃起来了。有的工人说：“领导权不能只看图章，要看路线。我们发扬当家作主的精神，积极参加企业管理，帮助干部把好路线关，就是有领导权。”有的说：“领导权要掌握在工人群众手里，也不能说只有我们工人讲了算数，干部讲的不算数。干部决定的事情，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固然要积极提出意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帮助干部改正；干部决定的事情，符合毛主席革命路

线的，我们工人就要全力拥护，全力支持，千方百计地去保证实现，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冲锋陷阵。这也是正确行使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如果我们不是自觉地发扬主人翁的精神，就是把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权力丢掉了，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忘记了。”在学习讨论中，工人们还学习了列宁的一段教导：“无产阶级只有意识到并实现这个领导权思想的时候，才是革命的。”工人们说：“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般的工人，我们要做革命者，要做有觉悟的工人。”

现在，在上钢五厂，不论干部和群众，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争做有觉悟的人。通过企业领导权问题的讨论，许多干部认识到，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因此，看一个企业的领导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今天，就看那里工人的马列主义水平是不是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责任感是不是加强了，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不是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由于这个厂的干部开始从理论上弄通了这个问题，依靠群众的自觉性就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厂党委和很多车间党组织，都专门开会讨论如何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使领导权能掌握在马列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这个厂的五车间，过去每年上半年生产二千吨左右扁钢，今年任务已吃饱了，而上级又要求他们再生产一千吨。开始，车间个别干部感到为难，不敢接。工人们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提高了觉悟，当他们知道这批扁钢是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做农具的时，说：“这是政治任务，困难再大，也要完成。”任务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规格有三十五个，几乎每班都要换规格，困难确实很大。可是，工人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和干部一起想办法，他们说：“班班换规格，也要班班夺高产。”结果，他们以十天时间就完成了三千吨的扁钢任务，比往年提高效率百分之五十。

### 在各尽所能上比贡献

如何对待和限制分配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法权？上钢五厂的广大群众，在学习理论问题中，既分清了两类社会两种工资制度的区别，又不纠缠在工资问题上兜圈子。

七车间的工人同志在研究怎样限制分配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时说：“我们决不能带着资产阶级法权的有色眼镜，斤斤计较。否则，我们就是把自己当作等价交换的商品了。”大家谈到：在旧社会里，资本家把工人的劳动力当作商品，买来买去。我们工人也觉得，做工就是为了拿钱吃饭。现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废除了，但这种传统观念还存在。我们有时把扳头凿子，叫做“吃饭家生”；工作积极，叫做“卖力”；儿女分配工作，说是“赚钞票”了；有的甚至说什么“按酬付劳”、等价交换，这说明我们头脑里还有传统观念、雇佣观念。这些旧的观念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就不能限制。讨论会越开越热烈，最后大家认为，对于“按劳分配”，要辩证地看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在承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同时，总是强调“各尽所能”，提倡共产主义劳动精神。他们说，我们在研究限制分配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时，要破除雇佣观念，决不能在报酬多少上兜圈子，要在



“各尽所能”上比贡献。

“不在报酬多少上兜圈子，要在各尽所能上比贡献。”这个口号迅速传开了。这个车间的乙班行车小组，九部行车、十五个人，过去有些同志在对待按劳分配问题上态度不正确，算来算去总是在多劳少劳上斤斤计较，滋长了“拿多少钱，干多少活”的所谓“按酬付劳”的思想，上班时先算三笔账：一算小调班的账，怕迟下行车晚下班不合算；二是算病假账，怕请假的，自己多做不合算；三是算岗位的账，怕到累、重、脏的地方去。这样，前一阶段就出现了“有人有车车不转”，甚至“人多车少也不转”的怪现象。自从学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联系实际讨论了如何在分配问题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以后，他们大破雇佣观念，决心超出“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从算小调班账、病假账、岗位账，改为算“各尽所能”的账，不仅做到了“有人有车车要转”，而且“人少车多也要转”。有些行车驾驶员还从“天”上“飞”到地上，帮助翻钢、吊钢、套链条。在其他车间，也出现了“学理论，见行动，不计报酬，忘我劳动”的生动局面。

“各尽所能”的思想一旦为群众掌握，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象喷泉一样迸发出来。不仅使人们又快又好地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而且激发人们关心全局，关心他人，在更多、更广的范围内尽自己的所能。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过细的分工以及由旧的分工所产生的等级制度，却限制着人们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进一步完善。就拿电炉炼钢来说，就有一炼钢手到六炼钢手的区别。六炼钢手只能挂料斗、翻渣包，“三级工才能上炉前，六级工才能当组长”，“下手”只能听“上手”的话，论资排辈，等级森严。文化大革命中冲破了这些清规戒律，但旧的习惯势力依然存在。有个四炼钢手工作不好，干部就要他去干六炼钢手的活，算是“惩罚”。这样，有的工人干完了“本职”工作即使没事干，也不愿帮“下手”干活，觉得不光彩。炉座之间“自扫门前雪”，互不“搭界”。

怎样冲出因分工产生的等级观念和分工过细所造成的“狭隘眼界”，为社会主义事业“各尽所能”？在一车间首先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发扬刻苦攻读的精神，阅读了十几篇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找出了革命导师关于分工和等级问题的一百多条语录，联系实际，在班组讨论会、工段辩论会以及车间交流会上，畅谈学习体会。有的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今天，“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也就同旧社会有着原则的区别。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毕竟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在分工问题上也就不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传统痕迹，使人们相互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存在。我们要象对待按劳分配的原则那样，努力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来加以限制。有的说：“在一定条件下，人们的相互关系对所有制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要从巩固全民所有制的高度来提高认识，做完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促进派。”

学习深入一步，思想境界就提高一步。全厂对于限制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人们说：“雇佣观念不破，斤斤计较不臭，主人翁精神树不起来；私有观念不破，本位主义不臭，‘龙江风格’

树不起来。”大家自觉地破除各种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想全局，急全局，千方百计为全局”的口号下，立足本岗位，眼望大目标，各尽所能，争做“份外事”。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增强物质基础的夺钢战斗中，全厂各个车间、部门、班组、工种之间，相互支援，通力协作。上一班为下一班创造条件，前道为后道提供方便，后方为前方主动出力。许多车间还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机修工也成立了“赤脚医生班”，哪里设备发生故障就到那里抢修，“打团体赛，炼风格钢”。人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这种共产主义协作精神，象钢花一样放射着夺目的光彩，有力地推动了钢铁生产。这个厂有一条红钢生产线，是将二车间的钢坯由运输部门热送到七车间开坯。过去，由于相互扯皮，热钢经常变成冷钢。通过理论问题的学习，大家从全局出发，努力改善相互关系，发扬龙江风格，热送钢锭的装炉温度普遍提高了一百度，不花任何代价，每年可增产钢坯一万多吨，节约用煤五千吨。

### 当拒腐蚀的自觉战士

夜很深了，在九车间党支部的办公室里，还是灯火通明。两委领导班子的同志正在开学习讨论会。这天学习的专题是“怎样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问题。

开始，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出身贫农，从小做工，党的恩情记心中，哪里来的‘资产’风？”也有的说，我们这里单位小、干部小，“坐在办公室，听到机器声，虽隔一扇门，还在群众中”，说不上有什么特殊化。但是，当他们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联系了实际，讨论就深入了。有个同志说：我们这里是个小单位，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并不因此就不来“找”我们了。大家摆出了不少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事例，认识有了提高。大家认为，有些事情，过去总认为很小，无所谓，现在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度一分析，不觉“大吃一惊”。“钢材生锈是从一个斑点开始的，抵制‘资产’风，改造世界观，也要象检验钢材一样，找出思想上的‘锈斑’，防微杜渐，这样才能清除掉变修的隐患。”

现在，在上钢五厂，通过理论问题学习，人们把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努力改造世界观，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土壤的伟大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

列宁说：社会主义“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要加速资本主义的死亡，就要大力扶植和发扬共产主义的因素，用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新作风，抵制“资产”风，把资本主义的旧思想、旧观念，从各个阵地、各个角落里排除出去。从学习理论问题以来，上钢五厂的许多车间，都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二车间职能党支部组织工人理论小组的同志，编写革命导师和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发扬共产主义精神、破除资产阶级传统观念的小故事，如《列宁和群众同甘共苦》、《毛主席和战士同吃一锅饭》、《白求恩献血》、《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等共有几十篇。通过宣讲、出专栏等各种形式，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四车间结合本车间的实际，把车间内一点一滴带有共产主义因素的先进苗子，集中起来，举办了“学理论、拒腐蚀、树新风”的展览会。在全厂，党委还总结了最

近因公光荣牺牲的第一电炉车间党总支书记、老工人赵汝恩同志的先进事迹，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他的共产主义精神。

赵汝恩同志今年四十三岁。一九五八年，他调来上钢五厂，当一名普通工人，以后入了党，当了干部，他的铺位一直安在车间办公室里。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因工负伤，大腿骨折，上了石膏，但他坚决不肯回家休养，说：“我是干部，不能离开第一线！”白天，他撑着拐杖，在炉前、工段来回检查工作，同工人们谈心；晚上，睡在电话机旁。工伤两个多月，他天天和群众战斗在一起。老赵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在日记上写着：“过去，我们靠艰苦奋斗打天下，今后，我们还要靠艰苦奋斗保政权。”直到现在，他家住的还是十分破旧的茅草棚，子女嫌不好，老赵却说：“旧社会劳动人民还住不上这样的房子呢！”有一次，一个朋友去看他，对他说：“老赵，你是车间头头，难道连修房子的材料都搞不到吗？我帮你想办法。”老赵说：“这样的事，我不干！”好几次，同志们和组织上动员他搬到工人新村里去，有一次已代他把手续办好了，只要他签一个字。但他却说：“草房能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草房能增强继续革命的思想。”平时，一家七口，睡的是长凳搁铺板，没有一张床。他家的一条被面，是他当学徒时买的，现在也已经千补百衲了，可是他还舍不得丢掉。每逢过年，他就拿出来给孩子们上阶级教育课。这几年，孩子几次提出要买一只大橱，放放衣服。他却一直不让买，说：“生活上追求享受，就容易造成政治上的堕落。”相反，他却把节省下来的钱买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学习资料。老赵同志是工人爱戴的好干部，群众称他是“贴心人”。他当“官”不象官，从来不摆架子，坚持参加劳动，对群众十分关心。四月二十四日，他在车间参加劳动时，脱模工序十分紧张，偏偏运载钢锭模的平车出轨了，运输突然中断，整个生产将受到严重影响。排除这个故障，是一件危险的工作。老赵亲自去操纵平板开关，平板车的一只钢锭模突然倒下来，老赵负了重伤，不幸牺牲了。

赵汝恩同志牺牲后，厂内许多干部、工人失声痛哭。他们纷纷表示，要学习赵汝恩同志的共产主义精神，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永远保持和发扬无产阶级的本色，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大力发扬共产主义因素，在上钢五厂广大群众中，正在产生着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巨大鼓舞作用和动员作用。“学理论、拒腐蚀、树新风”，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人们自觉地起来抵制“资产”风，用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自觉改造世界观，新人新事层出不穷。有一次，二车间食堂工作人员听了工人理论队伍宣讲《列宁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故事：十月革命刚胜利，列宁和苏联人民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当时每人每天只供应八分之一磅面包。有一次，服务员领回的面包数量比平常多，心里很高兴，给列宁送去。列宁问清情况，立即用刀子切下份外的面包，严肃地对服务员说：“快把这些面包拿去还了，以后可不能这样做了。”他们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心里很久不能平静。他们想起不久前食堂里来了一批枣子，有些同志就利用自己工作的方便，“近水楼台先得月”，买了回去。听了列宁的故事以后，甲班班长王春根想，伟大导师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连多一点面包也要服务员拿回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我们怎能利用方便搞特殊呢？在他的带领下，整个班的同志都高兴地把已经带回家的枣子，重新退回给食堂。很多工人

同志,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他们认识到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看到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建设的,我们要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他们说:“我们不仅要看到剥削阶级在我们身上留下的伤疤,还要看到在旧社会里沾染的泥巴。我们要不忘伤疤,洗掉泥巴,才能更加掌好印把。”

## 把心扑在祖国的钢铁事业上

“只有学习深下去,钢铁才能跃上去!”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深刻地改变着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精神面貌,极大地振奋着人们的革命精神,使上钢五厂的钢铁生产也不断出现着新的面貌。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广大群众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个教导,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看到我们国家需要钢,工业需要钢,农业需要钢,各行各业都需要钢,革命干劲鼓得更足了。工人豪迈地提出:“学革命理论,走大庆道路,把心扑在祖国的钢铁事业上,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干快上!”连日来,从炼钢炉旁,化铁炉前,到锻压机边,轧钢机畔,到处都在召开“学革命理论,促钢铁生产”的誓师大会。车间里,钢水奔腾,钢花飞舞,捷报连捷报,高产更高产。

这里,是第二车间的一次夺钢大战。

战斗正在紧张而激烈地进行着。突然,一场意外的事故发生了。有座炉子正当冶炼进入通电阶段时,蓦地“呼”的一声,插在炉膛中的电极棒断了。顿时,原来咆哮着的炉子变成了“哑巴”,透红的火焰从炉盖四周喷射而出,整个车间火光冲天,硝烟滚滚……怎么办?如果不及时换上电极棒,整炉钢就要报废,生产就会受影响。

“同志们,上!”九号炉炉长朱忠信大喊一声,一个箭步跨上了几百度高温的炉顶,双手握着断了的电极棒,紧张地干了起来。

“小朱,上去有危险!”平台上的同志们看着小朱都焦急地喊着。

滚滚热流把小朱熏得气也透不过来,熊熊火焰将衣服烤得直冒青烟,大颗大颗的汗珠从小朱脸上簌簌地掉下来。

“小朱,火要烧着了!”

“快下来,我们上!”

“别管我,快准备电极棒……”小朱咬紧牙关,没有后退半步,他以无产阶级战士特有的性格,顽强地同热浪搏斗。正是:烈火炼英雄,钢红心更红。

就这样,小朱和炉前工人一起,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及时排除了故障,换上了新的电极棒。哑了的炉子重新咆哮起来,炉膛里火光四射,车间里一片欢腾。这一天,全车间又夺得了新的高产,炼出了一千三百六十四吨钢,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从五月下旬以后,这个学理论一直较好的车间天天高产,不仅日产、炉产、班产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

纪录,而且炉龄、炉衬、炉盖等八项单项指标,也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

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起来,钢铁工人大干快上的劲头足了,钢铁工人的生产目的也更明确了。上钢五厂广大群众提出:在大干快上中,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批判产值挂帅、吨位挂帅,大打质量、品种之仗,全面实现多快好省。

八车间是这个厂唯一的大型锻钢车间,它担负着全厂各个车间和兄弟厂的锻打任务,全厂一半以上的钢材品种、规格是由这个车间生产的,任务很重。大家知道,锻件大的好打,操作方便,吨位也高;小的难打,吨位低,还容易出技术事故。因此,过去这个车间对八十五毫米以下规格的锻件,一般都不锻打。但今年国家要求这个车间生产的八十五毫米以下的各种钢材数量很大,接不接?干部和群众一起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识到如果片面追求产值、吨位,国家急需的品种不生产,搞刘少奇的“利润挂帅”“产值挂帅”,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不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那末,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有名存实亡、变成部门所有制的危险。接不接,实质上就是关系到用什么路线办企业的问题。这一讨论,给大家教育很大,看到小小锻件,却紧扣着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大事。广大工人和干部纷纷表示:“接!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的任务,就是要接!”现在,他们已主动向用户单位接了一千多吨八十五毫米以下的锻件任务,比去年增加一倍以上。为了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工人们“专政理论记心上,大干快锻夺高产”。有个班,过去一班只能锻二十支,现在一班锻了八十多支新钢种,产量增加了四倍。工人说:“吨位挂帅要批,国家急需的产品吨位就是要上,就是要拿!”

十里钢城红似火,火红钢红心更红。如今,一到这个万人大厂,只要看一看在学习体会文章旁边贴着的大红喜报、决心书、挑战书,就可看到工人们大干快上的劲头,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足,这样高。干部、群众,炉前、料场,前方、后方,心往一处想,汗向一处流。“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得越深,共产主义精神发扬得越好,干社会主义的劲头就越大,钢铁生产的产量就越高。”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在上钢五厂,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广大工人、干部,决心把这个学习运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进一步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加强调查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真正搞清楚,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本刊通讯员、记者

# 增强党的观念

——学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的一点体会

常 学 新

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论述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指出了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一九二〇年，在夺取政权不久的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于党的领导的问题存在着许多混乱思想。当时的德国共产主义“左派”就弄不清党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提出所谓“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的问题。根据这种情况，列宁尖锐地批判了那种把阶级和党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就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八七一年就已指出：“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毛主席进一步明确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担负着领导阶级的身份。但是，工人阶级对各阶级的领导作用必须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同时，党是用科学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有着一条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因此，它能够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并取得胜利。工人阶级只有在自己的政党的领导下，才能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才能担负起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历史证明，当工人阶级还没有组成自己的革命政党的时候，他们虽然已经感觉到自己同

厂主、同个别资本家的对立，并起来进行斗争，但他们还没有真正的阶级觉悟，还认识不清自己的远大目标和历史使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武装下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以后，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才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无产阶级才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

我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就是在以毛主席为伟大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正如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要进行这样的斗争，同样地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领导，实质上就是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一点，由于我们每个人觉悟水平不同，斗争经历不同，受到党的教育程度不同，认识当然也不完全相同。正因为这样，我们一定要在斗争中坚持长期学习，弄懂马克思主义，真正懂得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

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要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中所建立起来的各种革命组织，也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能不能正确处理党同其他各革命组织的关系，保证党对各个革命组织的领导，发挥它们的革命作用，这是关系到党能不能真正领导一切，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真正得到巩固的重大问题。列宁非常重视加强党对其他各革命组织的领导，充分发挥它们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并曾以党和工会的关系为例指出：“党直接依靠工会来进行自己的工作”，强调工会是建立起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联系的无产阶级机构。列宁十分重视工会的作用，认为党应当通过工会听取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同本阶级的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同时，列宁也指出了工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工会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工人阶级的一个巨大进步，它标志着工人由散漫状态进步到联合起来斗争的阶段。但是，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开始成长的时候，工会就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暴露出它原来所具有的弱点，如某些行会的狭隘性，某些不问政治的倾向以及因循守旧的积习等等。列宁特别指出，这种情况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工会的思想政治建设。列宁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这个阶级的又一巨大进步，这时候党更需要不仅用旧的方法，而且要用新的方法对工会进行教育和领导，同时不应当忘记，工会现在还是、将来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还会是一所必要的‘共产主义学校’和无产者实现其专政的预备学校，……”坚持党对工会的领导，充分发挥工会的革命作用，就能使工

会更好地团结教育广大非党职工群众，使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单位。

毛主席历来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性，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早在一九二九年，毛主席就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司令部对外”的错误口号，明确规定：“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这个决定强调在抗日根据地，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一个地区，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毛主席又反复强调必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这就是说，党委同各革命组织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在上下级关系上，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最高组织原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必须坚决服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对于党的路线、政策、决议都应当不折不扣地无条件地贯彻执行。

列宁指出：“严格的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同行者和结果。相反地，为了公开地和广泛地进行阶级斗争，必需发展严格的党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总是力图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浸染和腐蚀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为此，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坚决反对那些削弱党的领导和破坏革命纪律的错误倾向。同时，我们要教育党员坚持党的原则，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必须积极加强党的领导，积极发挥各个革命组织的作用，以发展当前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长期地坚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真正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怎样才能做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增强党的观念，自觉地为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在斗争中发挥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



# 在理论学习中加强党员教育

中共上海砂轮厂委员会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如何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对党员的无产阶级党性的教育,这是随着学习运动的逐步深入,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理论学习中加强党员的教育,重点是教育党员坚持无产阶级党性,抵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对党的生活的侵袭。由于党员的经历不同,所处的环境有差别,思想觉悟程度有高低,在商品交换原则侵袭面前的表现也不一样。因此,在抓党员教育时必须注意有的放矢。

我们厂有一些入党较早、革命经历较长的党员干部。这些同志基本上都能继续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种精神,“政治上高标准,生活上低标准”,为党的事业艰苦奋斗。但其中也有一些人追求所谓“工资高,待遇好,舒舒服服过到老”的生活,在胜利形势下滋长了停顿起来不求进步和贪图享受的情绪。所以会这样,和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革命经历有很大关系。比如有一个老党员,随着环境的变化,竟开始鄙薄“老八路”的作风,追求“不当头,不出头,样样东西要伸手”。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主要是引导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正确认识自己的革命经历。革命经历长,意味着自己受到党和人民的教育多,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人民多做工作。如果把革命经历当成是个人的“资本”,争名利,要地位,闹待遇,这决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实践表明,这些同志通过理论学习,回忆自己的成长过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完全能够自觉地打掉身上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厂发展了一大批新党员。这些同志敢于和资产阶级歪风邪气斗,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朝气蓬勃,为党增添了新鲜血液。但他们中也有一部分人,被群众批评为“入党前抢挑重担争上游,入党后松松垮垮随大流”;还有一些人从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出发,把“有数”、“兜得转”一类的坏作风带到了党内来。发生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和这些同志还没有真正从思想上搞清楚“入党究竟为什么”有关。因此,对于新党员除了要使他们懂得不能把入党看成“终点站”外,还要教育他们学习和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为此,我们在理论学习中,专门组织党员学习党的性质、任务和对党员的要求。这对大家启发很大。不少同志讲,我们加入党,是为了求得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彻底解放,应该挑起比平时更艰苦更繁重的担子;如果把入党看成是获得个人私利的手段,就会把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变成商品交换关系,成为象列宁所批评的那种“只想从执

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

实践还告诉我们，即使对一些表现较好的党员，也还应当继续对他们进行教育，进一步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我们厂有一个负责全厂废砂、废砂轮处理工作的党员。几年来，他接待过几千个客户，从没有收过人家一件礼物，兄弟单位的采购人员要替他代买土特产，也都遭到了他的拒绝。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同志认为：“拿了人家手短，吃了人家嘴软，弄得不好自己也要跌斤斗”。这就提醒我们，对坚持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办事的党员，党组织也不能因此而放松对他们的教育，应该使他们既懂得共产党员必须为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而斗争，又懂得为什么必须坚持这种斗争，从而使他们在长期的、复杂的反腐蚀斗争中经得住各种考验，而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否则，他们就可能在看得见的“资产”风侵袭面前打了胜仗，而在看不见的“资产”风侵袭面前却要吃败仗。

针对以上种种情况，我们通过举办党员学习班，召开座谈会，开展谈心活动和上党课等形式，组织党员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认识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伟大意义。同时，联系党员的思想实际，列了一些讨论专题。如：从有些党员抵制不了商品交换原则侵袭的教训，看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从部分党员“入党前积极、入党后歇歇”的变化，看正确认识党的性质、任务的重要性；从个别党员产生“船到码头车到站，革命到头不想干”的思想，看坚持继续革命的重要性。通过启发自觉，坚持正面引导，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广大党员在理论学习中经受了一次较为深刻的党性教育，提高了拒腐蚀、永不沾的自觉性。我们感到，这是一项大量的但必须长期坚持的工作。

要抓好党员的思想教育，关键是抓好党委一班人的自身教育。那种为地位和待遇而闹情绪的情况，那种搞小圈子、有损于党的纪律的情况，那种迎合“讲人情”“拉关系”一类旧习气的情况，在我们党委一班人和党员干部中也都发生过。在理论学习中，有些群众讲：“你们喊破嗓子，还不如自己先带头做个样子。”这个批评是很中肯的，它向我们提出了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的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中，我们党委在组织党员和群众学好的同时，认真抓好自身的学习，联系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开展思想交锋；同时，深入到党员和群众之中，一同来批评和整掉那些腐蚀我们思想、危害革命事业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这样，就把理论学习和党员教育工作推进了一步。

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指出了每个共产党员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性。我们决心进一步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党的建设，坚持同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腐蚀作斗争，使广大党员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青春。

# 漫话体力劳动 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康 立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四句诗是《神童诗》这部封建阶级启蒙读物的开宗明义第一章。看，它是何等赤裸裸地在鼓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尖锐对立！但是，剥削阶级却颠倒地认为这是天然合理和永恒不变的原则。从奴隶主阶级反动思想家孔丘、孟轲一伙鼓吹“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到封建文人鼓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直到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知识就是力量”乃至“知识就是金钱、地位”等等，其间贯穿着一条黑线，即无不鼓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尖锐对立是人类的天性。在他们的眼睛里头，如果世间不是这样一幅图景的话，那是天翻地覆、世道大变，简直可以说是宇宙的末日来到了。

那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和对立果真是与人类始终伴随在一起的吗？不，它同城乡对立一样，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中所发生的社会现象，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今天，我们必须把这种被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

在人类的远古时代——原始社会里，我们祖先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参加沉重的体力劳动，不是去参加狩猎，就得去采集果实，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就拿耕地来说，男子们在前面用尖的木棒挖起土块，妇女们在后面用木棍打碎翻起的土块，再往后是孩子们用手把土搓细，人人都得参加劳动，根本不存在什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即使是部落的首长、首领，也必须以社会一员的身份，共同从事体力劳动。我国古代传说中的部落首领神农氏，据说也得“身亲耕，妻亲织”，一无特权，二不得脱离体力劳动，并不象后人把他吹捧成“地皇”那样地神气。那时候，凡是当上头头的，除了负责氏族内部的事务以外，还必须在渔猎和农业生产的劳动中有突出的表现，只有劳动在先的义务，决没有不劳而获的权利。不然的话，就会被人们撤职和罢免，甚至被驱逐出氏族和部落。

在原始社会里有没有精神劳动呢？有。原始人自从产生了语言、有了意识以后，就开始了精神劳动。不过在那个时候，“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这就是说，脑力劳动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和现实生活的

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没有也不可能有凌驾于体力劳动之上的脑力劳动者。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情况下，你不“劳力”而专门“劳心”，谁来养活你呢！因此，原始文化艺术作为原始人类精神活动的结晶，是由广大劳动者所直接创造的，并且是和生产活动的内容不可分离的。拿绘画的起源来说，根据欧洲考古发掘的成果，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在西班牙、法国等地的岩洞里，先后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的壁画：用黑色或红色的颜料画的野牛、野象，背上被刺着投枪或箭矢，前脚向前倾倒。若问这些壁画的作者是谁？当然不是专业的画家，而是长期从事渔猎活动的直接生产者。他们画画也不是为了欣赏，当时的人们连肚子也很难填饱，哪有空去干这些闲情逸致的雅事？在原始人的眼中，这些壁画是一种咒语，可以使他们在猎取这些画中动物的时候具有某种魔力而保证能成功地擒捕，它本身是生产活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固然觉得很可笑，但当时的人们却是严肃而认真地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人类历史上的所谓“劳心者”，是伴随着阶级的出现而一起出现的。由于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从而为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准备了条件。面临着越来越复杂化的社会生活，从前与大家处于平等地位的氏族酋长、部落首领以及负责原始宗教文化活动的祭司等人，在这个时候逐步地摆脱了体力劳动，把主要的以至全部的精神力放在管理全氏族、全部落的事务上。于是，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管理者，便开始从生产者中分化出来了。这些人利用职权把原来属于共同所有的财物化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成了依靠“劳力者”为生的“劳心者”。正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分离了。至于文字，完全是在奴隶制形成后才出现的，它一出世就为奴隶主阶级所垄断，进一步巩固了劳心与劳力的分离和对立。到了后来，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国家的形成，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大批管理者和“劳心者”，就“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精神贵族，主要是由那些脱离体力劳动、高踞于群众之上的首领们逐步蜕变而来的。从这个时候开始，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成了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应当指出，在原始社会里文化艺术和科学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完整形态，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分工，才能推动文化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世界史上灿烂的古代文化，如古埃及的水利学和建筑学，巴比伦雄伟的宫殿和庙宇，中国殷周的青铜艺术，古希腊的文艺和哲学，等等，都是在这种大分工的基础上繁荣起来的。但是，奴隶制时代的任何文化艺术和科学发明，都是奴隶们辛勤劳动的结晶。就拿人类建筑艺术史上的奇迹——埃及金字塔来说，那座巍

然屹立的巨大金字塔，高达一百四十六米半，每边底长二百三十米，全由每块重二吨半以上的大石块堆砌而成。它就是十万名奴隶连续劳动了四十年的成果。归根到底，是奴隶们创造了历史而不是英雄们创造了历史。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大分工所带来的这种历史进步，是以人类史上付出了绝大多数人受少数人压迫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因此，这种贯穿着以往全部文明史的社会分工，始终表现为尖锐的阶级对立。

在奴隶制社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本质上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阶级对立的反映。精神活动的各个领域，都是服务于奴隶主掠夺与镇压奴隶的需要的。至于奴隶，只是被看作“会说话的工具”，被强迫从事单纯的体力劳动，陷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

在封建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表现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正如毛主席指出：“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可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卫道士为了掩盖和抹煞这种对立状况的阶级根源，总是强调地主老爷是天生聪明的，而农民群众则是天生愚笨的。那条孔门恶狗董仲舒所宣扬的“性三品说”，就强调“斗筲之性”的劳动人民理应受“圣人之性”的大人老爷的统治。欧洲的封建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说过，“才智杰出的人自然享有支配权，而智力较差但体力较强的人则看来是天使其充当奴仆”。这些反动理论的表达方式尽管不同，但实质都是为了论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的合理性。这样做的恶果是扼杀了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中世纪黑暗愚昧的状况。高贵者最愚蠢。欧洲封建贵族往往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只是任用一帮识字的书办和神甫来办事。教会垄断了文化教育，除了天堂地狱之类的宗教神学以外，根本没有科学文化可言。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贵族往往比白痴还要蠢。西晋惠帝听见蛤蟆叫，就问：这是“官蛤蟆”还是“私蛤蟆”？北宋的宰相蔡京有两个儿子，在回答“米从何处出”问题的时候，一个说出在石臼里，一个说出在草包里！至于那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封建儒生，整天只懂得摇头晃脑哼“诗云、子曰”，鄙视体力劳动，自以为高明得很，其实只是一群既不懂做工、又不懂种田的蠢才。那些经学大师们个个搞烦琐哲学，五经、十三经连篇累牍注释，越注越多，越弄越笨。历代中状元的，有哪一个是大学问家呢？相反地，卑贱者最聪明。封建时代被儒家咒骂为“奇技淫巧”的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出于那些社会地位低微、学问较小、条件较差的“小人”。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成了“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冲破了中世纪愚昧、闭塞、落后的状态，造成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已经不是昔日的所谓“粗野无知”的奴隶和农奴，而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雇佣奴隶，以便适应机器生产，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掌握着管理国家的全部职能，垄断着高度发展的科学文化和技术知识，把各种知识分子训练成

符合自己的口味而写作和说话的人，变成了货真价实的商品。什么教授博士，什么学者专家，不管他们如何自命不凡，如何标榜清高，终究只是资本所雇佣的奴仆。一切文化知识，一切科技发明，一切艺术创作，都可以买卖，可以交换，统统商品化了。总之，资本主义制度把“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生产过程里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深刻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叔本华叫嚷“一个个愚人凑起来也抵不上一个智者”，尼采宣扬“超人”哲学，认为“穷人”、“苦人”要受最有权力的“超人”支配。所有这些，无非都是为了维护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综观各个剥削阶级社会里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知道，“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后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每日疲于谋生，使它能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

但是，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却从根本上推翻了这种反动理论的根据。大机器生产发展的趋势要求打破旧的社会分工的束缚，要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可是，在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一切所谓“有教养的等级”，都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所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变成了鄙视劳动、无所事事的寄生虫。至于无产者则成了大工业机器的单纯附属品，成了提供剩余价值的雇佣奴隶。他们的聪明才智被摧残，他们的发明创造被扼杀。社会上脑力劳动的成果，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但没有减轻工人的劳动，反而强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掠夺。如此严重对立的存在，“日益成为阻碍工业生产力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同时也成为阻碍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阻碍文明交际方式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就成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伟大的历史使命必然地落到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无产阶级的肩上。既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是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那末，要消灭这种对立，首先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摧毁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也就基本上结束了千百年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尖锐对立。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学习文化、接受教育、掌握科学技术的权利。知识分子正处于深刻的改造过程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开始逐步走上了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也经历着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切，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带来的伟大成果。

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还存在着本质差别。例如，在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干部、管理人员、知识分子和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农群众之间，社会分工的界限还很明显，前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往往比后者优越舒适得多。更加重要的，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必然同阶级斗争相联系。那种反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旧思想、旧习惯势力，

如读书做官、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等等，至今还在毒害着人们，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至于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更是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因此，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一切旧传统观念的影响，才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不仅如此，这种差别又是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之前，在人类还没有获得全面发展即会做一切工作之前，在劳动还没有成为人类自身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前，是不可能彻底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为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

三大差别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土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果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不能正确处理的话，仍有可能重新发展成对抗的矛盾。新老资产阶级及其精神贵族，总是要竭力扩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进而全面地复辟资本主义。在今日之苏联，精神贵族、学阀之类的人物，把持了科学文化的各个阵地，过着同沙皇时代的贵族一般的生活，而工人、农民则重新陷于受压迫、挨剥削的悲惨境地之中。苏修叛徒集团还公然抛出种种优生学的谬论为这种对立辩护，吹捧精神贵族是最优质的、最有知识素养和最能干的人物；胡说“条件不好”的蠢才，最多成为一个“手工业者”，对他们的培养是“不可能”的，如同“在沙土或石头上‘播种’是无效劳动”一样。听吧，这里弹的不正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陈词滥调吗？！在我国，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刘少奇、林彪之流，妄图步苏修叛徒集团的后尘，拚命维护和扩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培植新生的资产阶级及其精神贵族，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黄粱美梦。林彪反党集团自称“天才”，“超天才”，攻击干部参加五·七干校是“变相失业”，污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所鼓吹的内容完全和苏修叛徒集团相同，两者贩卖的都是同一路的货色！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限制和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规定了“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方针，后来又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规定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阐明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号召“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象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正在蓬勃发展。这些革命措施，对于缩小和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三大差别是与阶级社会相始终的。随着阶级的最后消灭和生产力的的高度发展，这些对立和差别也必将消失。宏伟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激励着我们前进。让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吧！

# 商品自述(二)

景池

## 我家族孵化出了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是怎样出世的？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而是我家族长期孵化的结果。

在封建社会末期，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商品是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售的。手工业者在生产我们的时候，为了使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赚一点钱，不少人在动脑筋改进工艺和设备，提高技术熟练程度。但是，等到某种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普遍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时候，这种商品的价值就会降低，就会形成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推动了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那些生产技术落后、经营不善的小生产者的破产。而那些条件比较优越的小生产者，就踏着大批破产的小生产者的脊梁爬了上去，并雇用那些破产者作为自己的手工作坊中的工人。于是，资本家便出现了。

话得说回来，我孵化出资产阶级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并不限于通过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此外，我也把一些商人和高利贷者一批一批地孵化为资本家。

商人是一个不事生产的阶级。但是，他们利用各地对我的需求变化和价格的不平衡，在生产领域中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支配权力。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我家族有个生长在莫斯科郊外的同胞，名叫“假发辫”，生产它的主人是一些小生产者。他们原来是各自做出产品后自己到莫斯科市区出售，这样经常要把手头的生产停下来。因此，大家就委托给他们中间的一个妇女专门带假发辫到市区出售，并负责为大家采购原料；这个妇女在生产上的损失，则由大家共同出钱补偿。时间一久，这个女商人在莫斯科市区结识了一批客户，垄断了假发辫的出售和原料采购，就开始利用中间人的地位，在假发辫的交易中向买卖双方多报价目，并把这笔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变得越来越富裕。到了后来，假发辫的生产者都得看这个中间人的眼色，而这个女商人也就动辄对假发辫的生产者呼吆喝六：“愿意就拿来，不愿意就拉倒！”那些假发辫生产者都不熟悉买主，只得忍气吞声地听她摆布。最后，那些小生产者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变成了她的雇佣工人，这个女商人也就成为一个资本家了。



资产阶级出世后，我的活动规律也就起了变化。在小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者出卖我们家族的某些同胞，是为了换取另一些同胞，是为买而卖，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商品——货币——商品。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家手里拿着货币，走到市场买回商品，经过加工制作再拿出去卖，又取回了货币，这是为卖而买，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货币——商品——货币。资本家开头拿出去的货币和后来取回来的货币当然是不相等的，否则这个资本家不就成了傻瓜了吗？资本家的门槛精得很。他为卖而买，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更多的货币。这些多出来的货币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是一个重要的秘密。它涉及到我们家族中的新成员。正是这个新成员的出现，才完整地体现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 我们家族的新成员

我们家族的这个新成员是谁呢？说出来吓你一大跳：劳动力。

劳动力就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它作为我们家族的成员，要同我们一样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它要由它的主人自由支配，愿意卖给谁就卖给谁；另一个是它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这样两重身份。我孵化出资本家，促使了小生产者破产；那些破产了的小生产者的劳动力是具备这两个条件的。首先，破了产的小生产者一贫如洗，但却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要卖给谁就卖给谁；其次，这种劳动力也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这样，劳动力就参加进我们的家族来了。

资本家为什么要购买劳动力？原来我们家族的这位新成员有一项特殊的本领：它的使用过程，就是它的劳动过程；而通过劳动过程，它会创造新的价值。资本家使用劳动力，就是把劳动力投入劳动过程去为资本家创造新的价值。这个创造新价值的特殊本领，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

那么，劳动力的价值又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一个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需要穿衣、吃饭、住宿，还要养儿育女；有的还需要受一些学校教育，以便培养劳动技能。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者和他的家庭生活的那一部分消费资料的价值。当然，这些消费资料都是按最低限度计算的。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的货币表现，也就是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的价值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而我们家族的其他成员不仅不能自己创造出自己的价值，相反地，这种价值倒正是劳动力所创造出来的。资本家买来劳动力以后，迫使它在工厂劳动。在这个过程中，原材料、机器、厂房等一部分的价值被转移到它所制造的产品上去了；同时，它又使产品增加了新的价值。打个比方，资本家购买一个劳动力一天付出二元工资，这个劳动力劳动了六个小时，就把这体现二元工资的劳动力价值创造出来了。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工人在这时应该可以回家了。可是，这时资本家恶狠狠地跳了出来，叫嚷：“不行！我花了二元钱购买一个劳动力，要给我劳动一天，不能只劳动六小时。”要知道，工人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以后，他的身体就只能听凭资本家支配了。因此，不管他本人愿意不愿意，只好给资本家劳动一天，比如劳动十二小时，一共

创造了表现为四元的价值。这工人多创造出来的二元钱的价值，眼睁睁地就落到资本家腰包里去了。在政治经济学上，这一部分多创造的价值就叫做“剩余价值”。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目的就是为通过对劳动力的使用，攫取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不仅养活着资本家，而且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成了一个极其贪婪的吸血鬼，工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以榨取，资本家就决不会罢休。

## 我成了真正的上帝

自从劳动力这个特殊成员加入我们家族以后，以资本剥削劳动为轴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形成了。我们家族迅速繁衍，交换规模日益扩大，我们要求等价交换，我们要求贸易自由，于是我们冲破封建的关卡，越过帝国的疆界，活跃在世界各地。然而，尽管封建地主阶级那时已经腐朽了，但他们还是能够凭借着国家政权的力量压迫我们的发展。在当年的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率领着我们这个庞大的商品家族，勇猛地向着封建制度冲锋陷阵，显得生气勃勃。比如，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就出现了一大批象洛克、伏尔泰、卢梭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从理论上证明了自由、平等是人的天性（其实是资产阶级自己的天性），猛烈地抨击封建制度。他们大声疾呼：“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可是到处受到束缚。”其实，贸易自由、等价交换是我的天性，也是我的主人——资产阶级的天性。那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把我所需要的自由，说成是自然的要求；把我所需要的平等，说成是人类的平等，这完全是骗人的谎言。什么自由、平等，不过是为了我的主人资产阶级自己罢了。对于无产者来说，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受剥削的自由，挨饿的自由。不过，资产阶级的这些口号，在当时对于反对封建制度是有一定进步作用的。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在欧洲开始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新纪元。从此，我们家族依靠着资产阶级政权的保护，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进入了我们家族的黄金时代。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家族的成员，侵入了社会的一切领域，统治着一切人们。啊呀呀，真是神气得不得了！

在资产阶级的眼睛里头，我是他们唯一相信的真正的上帝。人们把我当作神来崇拜，这是早就开始了的，并不自资本主义社会始。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就写下了一首《好了歌》，里面说：“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一句话就点出了剥削阶级信钱不信神的实质。中国封建社会不少人信奉“赵公元帅”，这“赵公元帅”就是一个财神。但是，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我的崇拜才到了极点。十九世纪有一位英国人说得对，“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事实确实是如此。为了我，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开始发动了一场新的“十字军”远征，

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当时的欧洲资产阶级为了占领广阔的市场，修筑了铁路，开辟了航线，率领我们这支商品“十字军”，配备着枪炮，向古老的东方——人类文明的摇篮，去强行传播资产阶级的“文明”。

在向东方的进军中，我们首先到达了印度。在那里，我们进行了许多战斗，我们家族的一些成员，如机器织造的棉毛织品，气势汹汹地涌进了这个莫卧儿帝国，破坏了印度的村社经济，消灭了那里的手工纺纱业和织布业。印度被征服了，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英国资产阶级在这块殖民地上大量地培植了鸦片，并让它们一度充当了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们通过走私的方式，把大量鸦片输入中国，连骗带抢地把大量白银运回国内，犹如吸血鬼那样地贪婪。至于中国人民在鸦片毒害下所陷入的悲惨境地，他们当然是死人也不管的了。

有压迫就有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惊醒了中国人民。当时中国有个林则徐，在广大人民的推动和支持下，坚持把进口的大量鸦片付之一炬，真是大快人心。但是，英国资产阶级竟以此为借口，在一八四〇年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这就是有名的“鸦片战争”。昏庸腐朽的清王朝在这场战争面前，屈辱求和，割地赔款，向英国签下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古老中国的大门被洋枪洋炮轰开以后，殖民主义者将我们家族中在欧美出生的成员大量输入中国。它们每一个的头上都戴着一顶“洋”帽子，什么“洋布”、“洋火”、“洋伞”、“洋烛”、“洋钉”、“洋油”……，简直是无“货”不“洋”，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它们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把自己的中国同宗压得透不过气来。

我们家族的远征，从亚洲、非洲到拉丁美洲，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我们家族的脚印。大军所至，使许多国家和地区相继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把大批大批的民族和人民投入苦难的深渊。这个历史责任，当然要由我们的主人资产阶级来负，但我也不能逃脱干系。

## 我开始从顶峰上跌下来

十八、十九世纪的产业革命，新的“十字军”东征，使我爬到了历史的顶峰。我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离开我的运动，整个社会马上就会陷入瘫痪状态。登上了顶峰，就是下坡的开始。正当我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从娘胎里带来的毛病接二连三地发作起来了。

我这个病，种因于我的两重身份。我不是说过，我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两重身份吗？可是，我们家族的一个成员的价值只能用另一个成员来表现，并且只有在同别人交换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这一点对我可说是性命攸关。过去，我出生以后，我的主人将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心中大致是有点数的。铁匠今天打了锄头，明天就一定要拿到集市上去出卖，同附近农民的农副产品相交换。如果交换不成功，铁匠就会不打锄头，而打造别的能够出卖的东西，或者干脆改行。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情况就不同了。我出世以后，被带到这

里,接着又被带到那里,弄得晕头转向,有时甚至要转上十七、八个弯才让我停脚下来。我们的主人对于我的最后归宿,心中茫然。特别是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出现以后,我们家族成员的出生率空前提高了。但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却越来越贫困,他们没钱购买我们,缺乏消费我们的能力。于是我们一方面被大量地生产出来,一方面却大量地在仓库里睡大觉。“生产过剩”的危机出现了。在十九世纪,欧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多次爆发过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种情况,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就更加严重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我们家族历史上的黑暗年代。那一场经济危机,把我们折腾得好苦。那时节,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是我们的家族的扩大、扩大、再扩大,一方面是失业大军增加、增加、再增加。我们到处碰壁,或辗转旅途,疲于奔命,或滞留仓库,坐以待毙。商人停止接收我们,银行不再付出贷款,工厂纷纷停止生产。一场震撼世界的大危机爆发了。昔日爱我们如命的资本家,如今露出了一副狰狞的嘴脸。他们把我们家族大量成员判处死刑:纵火焚烧,挖坑活埋,倒入大海……我们家族的特殊成员劳动力也大批被踢出厂门,踉跄街头,流浪度日。我们当初培植出来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化的生产了。现在,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这样的情景还每天都或多或少地在重演。最近几年爆发的又一次经济危机,至今还在折腾着我们家族的许多同胞。我们这个大家族,外面架子虽然没有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渐渐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伟大的十月革命,给我们家族的黄金时代敲起了丧钟。物极必反,这是辩证法,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时代,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开始进入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纪元。至于我们这个家族,瞻望前途,不寒而慄,却不免有“夕阳西下几时回”之感了。

欲知我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命运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大海铺路》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5月出版

最近,一部以造船工人在七十年代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大海铺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通过跨龙船厂造船工人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建造“祖国”号万吨远洋巨轮和方匹机的战斗过程,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批判了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揭示了工业战线上尖锐复杂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

这部长篇小说是由上海市造船公司组织的工人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三结合”创作组进行写作的。小说的作者都亲身经受过轰轰烈烈的造船工业翻身仗战斗,他们满怀革命热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文艺创作,努力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塑造了在这场战斗中涌现出来的造船工人英雄形象,展现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造船工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作品生活气息较浓,语言朴实,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续完）

## 七、黎春华给吴大明的信

小吴：

这几天，我们正在学习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农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大家边学习，边调查，讨论得可热烈啦！

在讨论中，我们生产队的小张认为，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工农业两大部门的生产和交换是由国家统一计划作指导来进行的。农村需要的化肥、塑料薄膜等工业产品，不仅由国家统一安排生产计划，还根据支农的需要，逐步调整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促进了农业生产。农业上去了，又有力地支援了工业。因此，社会主义的工农关系是互相支援、互相促进的关系，根本不存在着什么资产阶级法权。

但是，许多同志认为他的看法不完整，理由是：支农产品调低价格，正说明工农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国家在有计划地加以限制。既然工农业之间还存在不同发展水平的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工农业产品之间还必须实行商品交换，资产阶级法权就必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我们农机厂的党支部书记老李在讨论中，讲起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九六〇年时，我们农机厂想试制脱粒机，需要添置一部车床，但市场上却又一下子供不上。怎么办？正在这当口，市里有个国营工厂来了个采购员，听后胸脯一拍说：“没有问题，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好了。”果然，不到两个月，一部新车床就送来了。一九六四年，我们公社开展了“四清”运动，发现那张发票上开列的卖车床的单位是废品公司。这下子引起了大家的怀疑。经过调查，才发现这原来是一部报废的车床。那个采购员同废品公司的一个科长相勾结，花了二百元的代价当作废铁买下来，又私下找人修理、油漆了一下，从废品公司作废的发票中找了张空白的一填，就当作新车床开价五千元卖给了我们。这一进一出，他们从中捞到了四千六百元，两人平分了。老李讲完这个故事，就要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大家谈到，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交换关系，机床是纳入国家计划范围分配的物资，不容许自由买卖。但正因为还存在着商品交换关系，那个采购员就通过非法渠道搞了一台破旧机床来捞取了大量的货币。这种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显然已不是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而是变成自由买卖的资本主义相互关系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要破坏工农联盟，使资本主义势力泛滥起来。那个采购

员和废品公司的科长，从表面上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似乎是“公平交易”，但就在这“公平交易”的背后，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家伙以废品冒充正品，虚报冒领，牟取暴利。事实上，只要还存在着两种不同所有制，还实行商品制度，资产阶级法权就仍然严重存在着。这种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反映到人和人的关系上，就是工农两大劳动阶级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出现的矛盾。无产阶级要通过工农联盟，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正确处理工农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则竭力通过商品交换的渠道，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破坏工农联盟，诱骗农民倒退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近年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我们社办企业实行“厂社挂钩”，除了支农任务外，还承担了一些国营工厂的产品生产和加工任务，和城市工厂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了。但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是无孔不入的。有的人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下，办什么事都要讲价钱，论斤两。你要他帮助解决生产上的困难，他就向你提出要当地的“土特产”；你要和他所在的单位在生产业务上“挂钩”，他就要你为他安插私人，还美其名曰“有来有往”。对这种“资产”风，革命的同志是坚决抵制的。一次，我们党支部副书记老张有个亲戚来找他，说有批建筑材料可以卖给我们，不过有个交换条件：要买几只我们厂加工的弹簧拿回家做沙发。老张当场就回绝了他，并严肃地批评说：“我们当干部的一言一行，都要想想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有利于工农联盟，绝不能搞那种资产阶级的歪门邪道。”

小吴，从这件小事中，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工农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以社会主义的原则作指导。如果让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这里得到泛滥，便会破坏工农联盟，瓦解集体经济，并使那些资产阶级分子得到大肆活动的场所。此外，由于还存在着三大差别，如果不加限制，听凭“重工轻农”、“留恋城市”的旧思想任意泛滥的话，那也是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的。这就是我们这次的学习体会。

好吧，信就写到这里。我们很想知道在你们国营工厂里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认识的。

致

革命敬礼！

黎春华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日

## 八、吴大明给黎春华的信

小黎：

昨下午收到了你的来信，看后很受启发。

在我们国营企业的内部，同样也存在着一个继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这个大变动，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企业中领导和群众之间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这些，同旧社会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但是，要真正做到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去正确处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必须经过长期的

斗争。就拿我们厂来说吧,由于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就不可避免地依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一部分人中间还有着一定的市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厂受刘少奇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干扰,一度实行了“一长制”,对工人搞管、卡、扣、罚,使人们的相互关系很不正常。那时,同一类型的机床,也要按机床规格分档,分工分得死死的,如果有部机床的操作工请了假,宁可让机器停下来,别人也不能使用。谁如果违反了这一“规章”,就要写检查、扣奖金。工人要搞点技术革新,规定要经过多少道手续,本人填了单子不算,还要经过多少人会签、批准,只要一个关口通不过,就被判处死刑。组织大生产,没有必要的规章制度当然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把工人的手脚束缚得死死的,那不就象用资本家管理企业的办法来对付工人吗?幸得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使我们厂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前几天看到一个关于苏联企业管理的材料,内容十分触目惊心。苏修中央在《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条例》中明文规定:“有关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力,由经理(主管人、主任)和按照职务分工规定的企业其他负责人员行使之”,企业经理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作人员”,有权出卖、转让或出租企业的生产资料,有权支配苏修领导集团留归企业自己支配的各种“经济刺激基金”。总之,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苏修叛徒集团委派的经理、厂长手里,而工人则只有受剥削和压迫的权利。在那里,厂长的话就是“法律”,违反厂长的意见就是“违法”。苏修企业的领导者同广大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成了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在那里,金钱关系、雇佣关系和竞争关系统治了一切,社会主义所有制早已蜕化为新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了。这个历史教训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建立起来以后,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是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是前进还是倒退的大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以后,要特别注意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亲自批示的“鞍钢宪法”,还有《五·七指示》,以及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都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有力限制,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深刻批判。只有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才能不断地自觉调整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

夜深了,本来还有许多话要对你说,正巧我们厂的党委书记到宿舍里查夜来了。他叮嘱我早点休息。我们革命大家庭就是这样温暖呵!好,就此搁笔。

致以

战斗的敬礼!

吴大明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

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 忆柯庆施同志二三事

叶伯乐

**编者按：**今年四月九日，是柯庆施同志逝世十周年。柯庆施同志的一生人对己都极其严格。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带头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对党内的侵袭。今天，上海的新老干部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的时候，重温这些事迹，有利于进一步焕发革命精神，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时间过得真快，柯庆施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柯庆施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的战斗一生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十年。“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火热的阶级感情，严格的科学态度”，是他一生革命实践的写照。他就是以这样的革命形象，一直活在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中。

一九五四年，柯庆施同志来到了上海。这时，在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一场在所有制方面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在来到上海以前，他就告诫周围的同志，去到上海这样的“花花世界”、“十里洋场”，可要当心啊！如果不警惕，头被人家割掉还不知道是怎么割掉的呢。确实，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资产阶级变得更加狡猾了，他们煽起的“香风毒雾”侵蚀和毒害了那些意志薄弱的干部。一九五七年初，柯庆施同志接到一份“报告”：中华造船厂一个党委副书记大肆追求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自称“革命二十年”，公开向党伸手，恬不知耻地要求国家“补”给他一万元钱，“离党离职”。当时，柯庆施同志极其气愤，马上要求在党刊上开辟“反对自私自利、争名夺利的个人主义思想”专栏，公布了这封信，发动党员进行严肃讨论和批判。

这个“报告”是一个信号。它告诉人们，资产阶级正在刮起一股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向无产阶级进攻。正是在这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柯庆施同志敏锐地看出，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他反复地对上海的干部说：“上海是个‘海’，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也是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地方。被花花世界蒙住了眼睛，就会掉进资产阶级的染缸里。同敌人



真刀真枪地斗，是看得见的。但是，资产阶级思想钻进我们的头脑里，不但看不见，有些同志还觉得蛮舒服哩。这是最危险的！”当时，上海有一些干部跳交谊舞的风气相当盛行，身心沉湎于“蓬、嚓、嚓”的生活之中。柯庆施同志经过一再的斗争，终于把这股歪风刹了下去。柯庆施同志说：每个干部要在办公桌上放一套《毛泽东选集》，还要在床头边上放一套《毛泽东选集》，一有时间就读毛主席的书，决不要一有时间就跳舞、打扑克。上海的干部一谈起柯庆施同志，都有这样的共同的感受：要不是柯庆施同志坚持在干部中不断刹住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知会有多少人跌入资产阶级设下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取得的又一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极大地推动了浦江两岸的大跃进高潮。正当一些同志埋头于机器声的时候，柯庆施同志收到了上海一位工人的来信。这封充满革命激情的信说：整风运动胜利了，整风精神永远不能丢！柯庆施同志读到了这封信，高兴极了。一九五八年四月底，上海市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柯庆施同志拿着这封信，一再教育全市干部记住这位工人的话：“整风精神永远不能丢！”这次会议一结束，柯庆施同志就到北京去开会了。临上车前，他特地又一次亲自将会上的报告修改定稿，把那位工人的话作为报告的中心思想。可是，柯庆施同志走后不几天，忽然在上海报刊上刮起了一股所谓“表扬风”，庸俗地吹捧那些“爱吹不爱批”的干部，把整风精神丢得一干二净。一时间，这股歪风在一些单位越刮越猛，乌烟瘴气，庸俗不堪。这是资产阶级在反攻倒算。

柯庆施同志从北京回来后，觉得这股风气味不对头，马上把有关干部找去查问。他手里拿着报刊，面容严肃，语调激动，严正指出：刮什么“表扬风”，这是方向错误！当有人说到“整风把干部整得灰溜溜的，应该让干部心情舒畅”的时候，柯庆施同志更是怒不可遏，他厉声质问：整风怎么会把无产阶级的干部整得灰溜溜的？！只有资产阶级才会感到“灰溜溜”！后来查明，这确实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使资产阶级难受极了，也使那些追求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干部很不好过。要把整风精神坚持下去，他们就更加不能容忍了。就是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市委中的走资派乘柯庆施同志离开上海的时机，带头刮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表扬风”，不但发动群众“表扬”干部，还要表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美其名曰“发扬共产主义精神”。那天，柯庆施同志刚下火车，为了查明这股歪风的根源，一直到下午一时才吃上午饭。饭后，立即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继续究本穷源，暴露了市委中那个走资派的面目，刹住了这股“表扬”歪风，端正了整风运动的方向。这对广大干部是多么深切的关心和爱护啊。绝大多数干部接受了柯庆施同志的批评教育，深入到群众中去了，用劳动的汗水冲刷思想上的污泥，用整改的实际行动同群众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同群众一道度过了那轰轰烈烈大跃进的日日夜夜，同群众一道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发起了进攻。

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农村人民公社在东海之滨的上海出现了。柯庆施同志坚定地认为：尽管上海地少人多，只要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付出辛勤的劳动，农业照样可以搞上去。可是，党内就是有那么一些向往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根本不考虑这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耕地虽少，他们还是想在淀山湖滨开辟什么风景区，好让他们这些

一心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物去游湖玩水。至于这样一来会减少粮田面积，影响粮食产量，这些大老爷们是一概不管的。

一九六〇年秋后的一个星期天，柯庆施同志照例不休息，出发到淀山湖滨视察工作。附带说一句，一有空就下工厂、下农村，早已成为柯庆施同志的习惯了。那时正是三秋时节，稻涌金浪，风飘谷香，社员正忙着收割，好一派丰收景象。但是，奇怪，不久以前还是弯弯曲曲的公路，如今怎么变得这么平直、宽阔了呢？“这要占用多少农田？这有什么必要？”柯庆施同志在喃喃自语。到了湖滨，一位老农正在植树，柯庆施同志就向前问个究竟。这位老农说：“这淀山湖要造大花园啦！路是替你们上海人开阔、开直的。”善于掌握群众脉搏的柯庆施同志，马上就从老农的话里听出不满来了。他又请教这位老农：“这里一亩田一年可以收多少粮食？”老农淡淡地说：“不多不少，千把斤吧！”听了这句话，柯庆施同志心情沉重，立即驱车赶回上海。在路上，迎面驶来了一辆大客车，挂着新华书店的横幅。柯庆施同志以为他们是来参加三秋战斗的，谁知一问，回答是“到风景区来游玩的”。这下子他心里完全明白了，筑大路，辟公园，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是谁干的？他心急火燎地回到办公室，立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彻查。原来，在当时的市委负责人中，就有人在散布这样的谬论：“上海人多，星期天没有地方去，搞个风景区，大家都有个去处了。”根子竟在这里！淀山湖离上海有百把里地，谁能有闲空去呢？搞什么“风景区”，还不是替这班拼命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增添一个寻欢作乐的场所吗？为了制止这种行为，柯庆施同志马上召开会议讨论。他激动地说：“上海郊区一共只有五百四十万亩耕地，再也长不出一分了呀！有人还要侵占农田，搞什么‘风景区’，不要吃饭了吗？谁要搞，就叫他去吃树叶！”柯庆施同志的喜怒哀乐，就是这样地紧紧和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联系着的。

“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在顺利的条件下是这样，在困难的环境中更是这样。每当想到柯庆施同志严以律己的精神，我们就更加感到搞生活特殊化的可耻。那正是我国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年月，柯庆施同志有一天回到家里，忽然看见一个管理机关事务的负责人，躲躲闪闪，欲行又止。柯庆施同志问他来干什么？他拉开笑脸说：“没有什么，来望望首长。”柯庆施同志最讨厌这种庸俗作风，又问：“到底来干什么？”那人才吞吞吐吐地说：“我们为了照顾首长健康，带来一些吃的，这不是特殊化，是机关农场生产的。”柯庆施同志马上警觉起来，厉声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关心群众？东西给我拿回去！以后再送什么东西，就不许你再上这里的门！”事情虽小，这又是多么正气凛然！

随着上海工业生产的发展，一批又一批新产品试制出来了。这时，在一部分负责干部中，出现了一股“试用”新产品的歪风。半导体收音机，他们要“试听”，新型手表，他们要“试戴”，新的衣料，他们要“试穿”，新的菜谱，他们要“试味”。总之，千方百计地巧立名目，化公产为私产，名义上是国家的，实际上是自己的。他们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来乘机捞一把。但是，这终究瞒不过柯庆施同志的耳目。他发现以后，立即把有关的人找来批评：“工人试制新产品，难道是为你们几个人的吗？”在我们干部中，不可否认，确有一部分人被商品、货币交换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有的人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有的人已

堕落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柯庆施同志生前，为了同这些人作斗争，为了教育广大干部，真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常常说：“中国古时候的铜钱，中间有个方方的眼，你一头栽进这个眼，就好比套上了枷锁，钻不出来了。千万不要钱迷心窍呀！”他经常提醒犯错误的干部：“你懂得驴打滚吗？犯了错误，如果不迅速改正，那也会象驴打滚那样，愈陷愈深呀！”含意深刻的比喻，语重心长的批评，多么严肃、积极、热情。除了少数顽固不化的分子以外，我们的许多干部就是在柯庆施同志的耐心教育下，逐步地清洗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跟上了千百万工农群众雄伟前进的步伐。

一九六三年冬天，正当市第三届党代表大会就要开会的时刻，柯庆施同志病了。尽管在病中，柯庆施同志还是如饥似渴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酝酿着在市党代会上的讲话。到了会议开幕那一天，柯庆施同志的病并没有痊愈，还是赶到会场，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对上海市党员干部的讲话。这就是著名的《为促进干部、党员思想革命化和各项工作革命化而奋斗！》的报告。这个报告是那样地扣人心弦。他说：“所谓革命化，就是无产阶级化，就是共产主义化，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彻底克服其他一切旧思想、旧习惯。”他又说：“干部、党员革命化，是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前提。”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能造成低级趣味，也是滋长修正主义的温床。它是革命的大敌，应该坚决把它反掉”。

这个报告发表在上海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开展的关键时刻，它犹如响亮的警钟，再一次教育上海的党员干部丢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它好象一次战斗的动员，激励党员干部在向新老资产阶级发动的猛烈进攻中冲锋陷阵。参加党代会的代表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柯庆施同志的报告，一下子提起了这次党代会的纲，把人们的精神境界引导到新的高度。在当时，“实现思想革命化！”的战斗口号，成了全市党员的行动准则。十多年过去了，柯庆施同志提出的干部、党员思想革命的号召，还是象洪钟一样在人们的耳边回响。今天，我们许多同志回忆起来，都异口同声地说：“幸亏柯庆施同志对党员干部从严要求，使我们少犯了不少错误。要不，在上海这个‘海’中，也许不少人闯不过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哩！”

一九六四年春天，柯庆施同志又一次病倒了。不久，他就同上海人民永别了。柯庆施同志逝世后的这十年，是波澜更加壮阔的十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把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推向深入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许多老干部重新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大批新干部正在蓬勃地成长。今天，正当我们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时候，柯庆施同志这位以身作则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前辈的战斗形象，又一次浮现在我们面前。他始终站在革命行列中间，鞭策我们彻底打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教育我们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勉励我们永远保持革命青春，永远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 读一个旧《通知》

季 昌 华

摆在面前的这个《通知》，是焦裕禄同志在一九六三年为中共兰考县委亲自起草的，它明确要求“全县党员、干部做到十不准”。（见附录）

这是个既平常又不平常的《通知》。说它平常，是因为它规定的“十不准”，对每一个党员、干部来说，都是应该做到的起码准则；说它不平常，是因为它规定的每一个“不准”，都闪烁着无产阶级党性的光辉，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提出了勇敢的挑战。今天，我们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潮中，重读十二年前的这个旧《通知》，依然感到新鲜、亲切。

《通知》规定的“十不准”，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划清了明确的界限。比如，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谁看戏谁拿钱，谁吃饭谁拿粮，一律不准向社员摊派；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国家统购派购物资；不准用集体名义或个人向财贸、商业、供销、粮食等部门，要求制度以外的特殊供应，等等。这一连串的“不准”，集中到一点，就是不准利用职权搞特殊化，不准刮“资产”风。毛主席说：“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我们当干部的，做党员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应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克己奉公，不谋私利。“十不准”的每一条，都具体体现了立党为公的坚定原则。“十不准”的反面是“十准”或者样样“准”，即容许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自由泛滥。因此，“准”还是“不准”，虽只是一字之差，却是“泾水清清渭水浊”，体现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同剥削阶级官僚政客的根本区别。

这也“不准”，那也“不准”，是不是太严了一点呢？当然是很严的。这个严，早就成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早在井冈山的艰苦斗争年代，毛主席就已明确地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规定为三大纪律之一，不准对群众利益有丝毫的侵犯；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战士路过盛产苹果的锦州不拿老百姓一个苹果。毛主席说：“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并且高度赞扬了这种严格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枚针，一根线，一个苹果，为什么不能拿不能吃呢？就因为它是属于人民的。焦裕禄同志提出的“十不准”，不正是这样一种严格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吗？在关心、爱护、保障人民群众利益这一点上，斩钉截铁，半点不含糊，这正是无产阶级的严格纪律的体现。

这个严好不好呢？有人说，“十不准”从吃饭到看戏，从办喜事到买东西，样样都管到了，“管头管脚”，有点不近情理。这话说得不对。对于“情”和“理”，也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去作分析。按照“十不准”去办，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

团的利益出发,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情”,共产党员之“情”;有了权力和地位,自以为高人一等,养尊处优,任意侵占国家和群众利益,那是剥削阶级的“天经地义”,一丝半点也不合马克思主义之“理”。资产阶级为了腐蚀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是很希望去掉“十不准”的那个“不”字的。请同志们想一想,这个“不”字一丢掉,对那些群众不高兴的事情这也“准”,那也“准”,听凭党员和干部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危险情景啊!

坚持“十不准”,用马克思主义的“情”和“理”严格要求党员和干部,这是对党员加强党性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保障了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对广大党员和干部来说,也是一种真正的爱护。固然对于一些缺乏自觉性的同志来说,会感到这种“严”是个“约束”。但“约束”这些同志不受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侵蚀,帮助他们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从反修防修的高度来看,这完全是桩大好事。

“十不准”如此之严,做得到吗?焦裕禄同志就做到了。焦裕禄同志对他自己所规定的每一个“不准”,都带头不折不扣地自觉执行。你看:有人见他工作忙、身体差,给他送鱼、送肉,可他拒绝了;有人见他家庭困难,提议补助他救济款,他坚决不收;有人托他把子女弄到县城工作,他不准办。有一次,焦裕禄的儿子到剧院看戏,检票员一看是县委书记的儿子,就免票“照顾”入场了。焦裕禄同志知道以后,当晚就开了家庭会,严厉批评孩子:“你为什么闹特殊?”第二天就叫孩子拿两角钱到戏院“补票”。焦裕禄同志能够做到的,其他同志为什么不可以做到?当然,要真正做到“十不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要求我们的同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俗话说:打铁先得腰板硬。要求别人做到的事,首先应当自己带头做到,言传身教,才能发挥革命榜样的无穷力量。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县,是三十六万人民的带头人,可他鄙薄任何一点特权思想,总是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毛主席说:“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事实正是这样。哪里的党员和干部能够艰苦奋斗,凡事出以公心,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里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受到了打击,那里的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结果必然是革命和生产欣欣向荣,出现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焦裕禄同志起草的《通知》中,十分强调“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党员干部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带头人,他的思想言行包括生活作风直接影响到带领本单位或本地区的群众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提倡一种什么样的风气,事关重要,不可忽视。凡是革命的同志都应当向焦裕禄同志学习,艰苦奋斗,严于律己,为革命为人民而献出个人的一切。

这个旧《通知》是十二年前写成的。今天的中国,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较之当年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革命要求。但是,这个旧《通知》所反映的革命精神却并没有因此而过时。党的优良作风是我们的传家宝。这个旧《通知》,如同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一样,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生动教材,也是我们的传家宝。它是无产阶级在革命长征路上留下的光彩照人的历史足迹。当我们回顾成

千上万革命先烈在革命征途上走过的这种脚印时，每次都从中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激励着我们踏着先烈们的脚印，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前进，再前进！

## 附：焦裕禄同志当年为中共兰考县委 起草的通知

新年已过，春节将到。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县人民在中央、省、地委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坚持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因此，我县形势和全国全省一样，一年比一年好。一九六三年我县全党全民的中心任务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争取以粮棉为中心的全面大丰收，争取形势的更大好转。只要我们鼓足干劲，做好各项工作，今年的形势一定比去年更好。在大好形势下，全县人民想过一个快乐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既要使群众欢欢乐乐、心情舒畅过好春节，又要勤俭节约，防止浪费。必须了解我县形势虽有很大好转，但生产、生活上还有很大困难，还有灾区。我们必须贯彻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不论公家和私人都不要浪费一文钱。可以不用钱坚持不用，应花的尽量少花，可以不办的事坚持不办，一切从生产出发，从节约出发。为此，县委、县人委特作如下通知：

全县党员、干部做到十不准。

1. 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
2. 不准参加或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
3. 不准赌博。
4. 不准用粮食做酒、做糖挥霍浪费。
5. 不准拿生产队现有的粮、款或向社员派粮派款唱戏、演电影、办集会和其他娱乐活动。谁看戏谁拿钱，谁吃饭谁拿粮，一律不准向社员摊派。
6. 业余剧团只准在本乡本队演出，不准到外地营业演出，更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大肆铺张浪费。
7. 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国家统购派购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十排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完，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
8. 坚决反对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国家的或生产队的物资；坚决禁止利用封建迷信欺骗和剥削社员的破坏活动。

（下转 40 页）

# “函授”日记摘抄

复旦大学新闻系 林 帆

## 为“小儿科”一护

今天在招待所办好住宿手续出来，碰到一位过去在大学的同学，现在他也同我一样在高等学校教书，又属同行。久别重逢，喜出望外，话也特别多起来了。

“哎呀，是你呀！”

“啊！太巧了，干吗来此地？”

“搞函授。”

没想到我的老同学拍拍我的肩膀，一本正经地说：“怎要你老兄搞这‘小儿科’？”

.....

“小儿科”？多么刺耳，又多么耳熟。从前，土记者萌芽出土，曾听到有人说过“小儿科”，赤脚医生初露苗头，也听到有人说是“小儿科”；如今从大城市来到农村为知识青年搞函授教育，也给安上了这个“雅号”。有些人总爱把新生事物比喻为“小儿科”，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一种轻蔑的意思，总之，是不那么看得上眼吧！为什么这些同志会对新生事物采取如此冰冷的态度呢？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我又想到，即使算是“小儿科”吧，又有啥不好？能让人家比喻自己为“小儿科”大夫，我应该引以自豪！可不是？新中国的

少年儿童，是含苞欲放的花朵，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接共产主义的班，还得靠他们哩！新生事物之所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因为它代表了发展的方向。别看函授教育现在还需要大力扶持，但它却和初生的小儿一样方兴未艾，前途未可限量。因此，我们要热情满腔地为它催生，更要以十倍的细心加以爱护和培育，使它健康茁壮地成长。如果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这点，那在不久的将来，一簇簇灿烂夺目的函授之花，一定会开遍祖国的村村寨寨，使今朝的锦绣山河更加好看！

其实，当好一个小儿科大夫，也不容易。一般医生，可以通过对方的应答来诊断，而孩子不懂事，疼在哪里，伤在何处，除了哭之外，别无更多的对应；严寒回暖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作为小儿科大夫，不仅要摸透小孩脾气，特别精心护理，还要时刻细致观察，研究他们生理上的反应。没有一颗火热的心，没有自甘俯首为牛的精神，那就当不好小儿科大夫！凡是函授教师，都应该努力向小儿科大夫学习。学什么呢？学他们精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学他们对革命后代无限深厚的阶级感情。为了这个缘故，我恨自己缺乏搞好这项工作的本领，同时也为自己能与这样的“小儿科”沾得上边而感到骄傲！

## 备课外的一课

在井冈山区和兼职教师一道备课的会开过之后，心里一直不平静。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这是千真万确的。到了下面，不仅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是我的好老师；我们的教育对象、千千万万正在成长的知识青年，也是我的好老师。今天，知识青年小邓就给我上了很深刻的一课。

小邓是最早一批从上海来井冈山插队的红卫兵。七年来，他在老革命根据地的革命精神哺育下，取得了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去年，他当上公社中学的赤脚教师。今天，公社又选派他做业余函授教育的兼职教师。兼职教师，硬是加班加点的义务劳动。事先我听说，他是个忙人，平时的学习、教课、改作业、思想工作，已经够呛了。再加上一个比较繁重的兼职，困难可想而知。但是，他在会上首先不是摆困难，而是谈自己怎样充满信心、下定决心地迎着困难上。他说，他是受了党的委托，贫下中农的信任而来的，怕苦怕累干不了革命；贪图安逸、怕负担重，就限制不了资产阶级法权。如果为了舒服，当年就不会千里迢迢从上海步行来井冈山插队。会后，我私下问他凭什么克服困难的。他犹豫了一阵，才回答说：“怎样讲呢？这些年来碰到的困难确不少。可是我常想，当年老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这里艰苦创业，靠的什么？还不是靠不怕苦不怕死和不计较名誉地位的革命精神？喝了七年井冈山的水，我多少应该懂得一点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真不愧为革命摇篮中的一代新人。这番话，说得多好啊！小邓当教师，收入和贫下中农一样记工分；自己是个中学生，由于

革命需要，却教中学的课，当班主任，搞团的工作。现在又兼任函授教师，担子千钧重哟！然而，更可贵的是，肩膀不断加压，他不出怨言；工作那么繁重，他不计报酬。到底是什么精神力量使他有这股革命热情呢？很简单，因为他喝了井冈山的水，懂得为谁辛苦为谁忙。于是，我联想到我们自己的精神状态，不禁感慨万千了。最近几年，我自甘吃“老本”，最怕挑重担，这和小邓为革命自找“苦”吃的风格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说，晚上要加班学习，我认为是额外负担；临时接受一个战斗任务，又是额外负担；要开一门新课，更是视为畏途的额外负担。总之，最好是维持现状，相安无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额外”思想在脑子里层出不穷，自己都快变成老“油条”了，可是竟安之若素。而从前就不是这样的：每年大学招生改考卷，是额外的，却不成为负担；到校外去作个什么报告，是额外的，也不觉得是负担；报纸刊物要约个什么稿子，是额外的，更不成其为负担。为什么呢？说穿了，因为改考卷有额外报酬，到外面做报告，给报刊写稿，更是名利兼收。原来我们以前的那种积极性，正是由如此这般的物质刺激调动起来的。看来，当时这样卖力，不外乎把自己当成“商品”，善价而沽罢了。记得过去有过这样一位教授，在评级时没有争到他自己认为应该达到的级别，便消极怠工，每次上课都提早十分钟下课。学生批评他，他却“理直气壮”，说是按酬付劳！这话里有多少铜臭味？和小邓的任劳任怨的革命精神相比，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两种风格，两种表现。看看在这里坚持战斗的小将，想想我们的过去和现状，我不禁感慨万千！



# 论“气派”

陆丽芬

“这个人怎么一点派头也没有？”这是某些人常从嘴角边上溜出来的一句话，但听起来却总觉得怪刺耳的。

怎样才算有气派？革命的气派是什么？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得从焦裕禄同志吃药的故事说起。一九六四年春天，焦裕禄同志得了严重的肝病。同志们劝他疗养他不听，医生给他开了药方他不配。兰考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了三剂中药，强着他服了，可他执意不愿再服第四剂。他嫌药价太贵：“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

这种行为在某些人的眼中是无法理解的。堂堂一个县委书记，又是公费劳保，竟连几剂中药也不舍得吃，几元钱也不肯花，真是一点气派也没有。但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来看，这恰正反映了焦裕禄同志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无产阶级气派。

气派，在阶级社会里从来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剥削阶级过的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生活，他们动辄讲排场、摆阔气，以挥霍劳动人民血汗为荣。一席千元的盛宴，一掷百元的名药，这在他们的眼里都算不了什么。《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就以她家里在接驾时“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为有气派的。但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从来鄙夷这种地主资产阶级的老爷气派，认为这种气派可耻得很！焦裕禄同志为兰考县的革命和建设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兰考县的人民为了替焦裕禄同志治病，不要说几元钱，就是几百元、几千元也都舍得花。但焦裕禄同志却不是这样想的，他心目中处处想到的是群众。人民的劳动果实，一个子儿也不能随便花掉。是他，第一个冒雨把家属搬出了县委机关的大院；是他，坚决不要组织上任何的特殊照顾；是他，顶住了那个要修饰、翻新县委机关的建议，提出“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是他，一发现孩子看白戏，就立即严肃地进行教育并命令孩子把票款如数送还了戏院。这种克己奉公、一丝不苟的行为，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最严厉的批判。事情虽小，却处处映照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心灵，闪烁着共产主义的思想火花。相形之下，那些资产阶级气派是显得何等地卑鄙！

其实，气派的大和小，从来就不是绝对的。那些思想上严重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当他挥霍国家资财的时候，气派确实很大，可说是一掷千金无吝色；但如果要他为革命、为人民而牺牲自己个人利益的时候，那气派可实在是小得可怜，“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有的人认为干部大就应当气派大，如果这指的是资产阶级的摆阔气、讲排场，那可完全是不对头的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和相互关系，决定了干部与群众的地位是平等的。

两者分工虽有不同,但都是为着同一个革命目标而奋斗,都应当无条件地为人民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马克思早在巴黎公社时期,就要求各级革命干部成为“社会公仆”。毛主席也一贯提倡:“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焦裕禄同志就正是这样地按照着毛主席的教导去身体力行的。他二十年如一日,对待自己十分苛刻,气派确实小得很;但他在对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上,却有着伟大的气派。就说他刚到兰考的那一年,正是全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但是,他不仅没有被困难所吓倒,相反,头脑里早已经在盘算着改天换地、重新安排山河的大事业了。他见到沙丘,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说:“这里可以栽苇、种蒲、养鱼。”见到碱地,说:“治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看,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又是何等伟大的气魄!这种气派,光照日月,气吞山河,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有了这种气派,他身患肝癌,却与调查队的同志在齐腰深的水里吃干粮,夜晚蹲在水里歇息。有了这种气派,他迈开双脚,跋涉了方圆五千余里,摸清了灾害的来龙去脉。有了这种气派,连年受灾吃国家救济粮的兰考县,三年翻身,卖余粮了。

鲁迅说过:“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这也可以作为焦裕禄同志的写照。他取之于人民的,甚少,献之于人民的,甚多。兰考人民说得好:“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是多么伟大的气派啊!

不同的气派,实际上是不同的世界观的反映。焦裕禄同志的这种革命气派,归根结底,是由他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决定的。我们要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改造世界观,坚决“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打倒资产阶级老爷气派!

(上接 36 页)

9. 积极搞好集体的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反对弃农经商,反对投机倒把。

10. 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不是不准结婚),做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

任何部门,任何人,在春节期间,都不准用集体名义或个人向财贸、商业、供销、粮食等部门,要求制度以外的特殊供应。这些部门的领导和职工,都有权拒绝违犯制度的要求。财贸部门的职工,更应该带头执行制度,不多吃多占,不开后门,对一切违犯制度的现象,每一个职工,都有向县委、人委、监委直到中央告状的权利。

以上各条,若有违犯,轻者批评教育,重者处分,直至依法惩办。

此通知发至各机关(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学校、各区和公社)。各机关接到此通知,要立即向全体干部宣读,并组织讨论;保证贯彻执行。各区、各公社接到此通知后,区、公社和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干部,可先召开党支部大会宣读讨论,教育党员带头执行。再由党员和干部直接到生产队宣读,并组织讨论,达到家喻户晓,互相监督,贯彻执行。

一九六三年元月八日

# 份内、份外

龚 青

要看新鲜事，不一定要上展览会。星期天经过南京路，无意中就看到一桩：这是一张贴在食品店墙上的上海市区图，上面标明着上海几家回民饭馆的分布地点。

不要小看这张分布图。大家知道，回族兄弟的习惯是忌吃猪肉的。在上海这样一个街道纵横交错、路名五花八门的大城市，别说路过上海的回族同胞要找到一家自己民族风味的饭馆很不容易，就是“老上海”恐怕也很难说全哩。

这张图究竟对人民生活提供了多大的方便，这且不说。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出来的，是那些绘制这张分布图的人。按理说，这些食品商店的革命职工，经售糕点糖果是份内事，制图是份外事。份内、份外，这是一道界限，对某些人来说是同高墙一样地隔绝着的。份内事有责任、有报酬，份外事没责任、也没报酬。只要事属份外，你不去做，也没人来责备，这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了。但我们的革命职工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他们越出了本份，拆掉了份内、份外之间的这堵高墙。

越出了本份这道墙，其实也就是越出了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对人们所造成的狭隘眼界。资产阶级法权讲究商品交换原则，付出一点什么，就非要捞回一点什么不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买卖关系。在资产阶级那里，谁不顾这一套而竟干起于己无利的份外事来，那就会被当成疯子，是活该遭受天诛地灭的。虽然资产阶级有时在表面上也讲“侠义”，甚至热心地干点份外事，但鲁迅一语点明了本旨：“义者，利也。”归根到底，吃小亏的目的是为了占大便宜。我们的革命职工则完全相反，他们的做份外事，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跟资产阶级法权观念针锋相对。你看，这种精神多么可贵！

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革命队伍中，这样的先进人物正在成千上万地涌现出来。比如，劳动所得，光荣享受，不也是一种“份内”的权利？可雷锋同志平时省吃俭用积下几百元钱，一当听到远地农村受灾，就一下子全部寄赠给当地人民公社了。一个是做“份外”工作，一个是放弃“份内”享受，两者的形式虽有不同，但都是拆掉了那个资产阶级法权在份内、份外之间所造成的那堵高墙。列宁说，共产主义劳动“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树立共产主义的风格，在份内、份外之间拆墙填沟，凡是革命所需要的，我们就应当努力去做，根本不应去计较什么这究竟是份内呢还是份外？

末了，想问一句，同志，你对革命的份外事是如何看待的呢？

# “钱能通神”及其他

谷 卓

“钱能通神”，这是古今中外的剥削阶级所崇奉的一句格言。至于这句话的出处，却一向未曾留心过。近日翻阅史籍，方知这句话最早见于魏晋时人成公绥（公元231—273年）所作的《钱神论》，文中描述当时的世间情景是：“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你看，行人们往返奔波，赶着车子到处钻营，追求的就是那个金钱。

在第一篇《钱神论》问世以后约一百年，出现了第二篇《钱神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鲁褒。他在文中辛辣地讽刺了东晋元帝、康帝以来的贪财恶习，形容那些“无翼而飞，无足而走”的金钱，在当时“为世神宝”，“谓为神物”。而钱神的身份之所以高贵，是因为“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这样一来，人们的政治地位或等级完全取决于金钱的多少：“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闻笑谈非钱不发。”钱神具有如此颠倒众生的魔力，神通可谓大矣！

其实，慑服于钱神魔力的又岂限于世间众生，就连天帝见了钱神也还得甘拜下风哩！鲁褒在《钱神论》中就发出了“天有所短，钱有所长”以至“天不如钱”的慨叹！短短一个世纪，先后出现了两篇《钱神论》，深刻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追求金钱的欲望到了何等强烈的程度。这种情况，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保持以来，求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也日益增大。”

人们对金钱的看法，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从来是受着各国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制约的。在欧洲古代的奴隶社会，金钱曾经遭到过人们的愤怒诅咒。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7—前406年）就这样痛斥过：

人间再没有象金钱这样坏的东西到处流通，  
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  
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作些可耻的事，  
甚至叫人为非作歹，干出种种罪行。

很明显，金钱之所以在当时成为可诅咒的东西，是因为它从古代社会“换走了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资本论》第一卷）。金钱斩断了原始公社的纽带，出现了人们残酷地对待自己同类的青铜时代。看来，索福克勒斯和鲁褒对钱神的讽刺和憎恨，均为此而发。

但是,真正对“钱能通神”狂热信奉的,还得推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商品生产交换的黄金时代中,“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航海家、美洲大陆的发现者哥伦布(公元1451—1506年),在他从牙买加发出的信中说:“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金钱能使人的灵魂升入天堂,这不就是“钱能通神”论的典型语言吗?

货币作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之前早就存在了。但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货币才转化为资本,成为只有依赖吞噬活劳动才能使自已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怪物。至于资本家本人,则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资产阶级来到人间,是同金钱相依为命的。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中又说到:“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它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它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正是这样,资产阶级才把金钱当作心目中的真正上帝。凡是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的地方,钱神到处在胜利地行进,利己主义的冰水犹如怒潮一般冲垮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堤防,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原先笼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封建宗法的面纱,这时也被统统撕得粉碎,就连所谓良心、名誉等等,也都变成了商品,被用来进行一切最无耻的交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这样地刻划了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嘴脸:“象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颂扬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

资产阶级不仅自己狂热地崇拜钱神,还力图用这种“钱能通神”的拜金主义去侵蚀和分化工人群众。列宁曾深刻地揭露过:“在一切先进国家里,我们都能看到工人阶级的领袖和上层分子腐化堕落,出卖灵魂,倒向资产阶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施用小恩小惠,把‘肥缺’赐给这些领袖,把自己的利润的零头赏给这些上层分子”。(《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当时俄国的“经济派”,就无一不是资本家用金钱收买的走狗。他们干着资本家所不能干或不便干的无耻勾当,宣扬什么“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是工人运动的“座右铭”,“对每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和可贵。”这些带头羊在工人队伍中煽动经济主义,妄图使工人群众满足于一点资产阶级嘴角边淌下来的残羹余汁而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远大目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钱神是资产阶级的保护神,对于广大工人群众来说,它是凶神、恶神,是一个具有吉祥天女外貌的吸血恶魔。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人剥削人的制度被推翻了,所有制变更了,“钱能通神”这种论调是否绝种了呢?没有。苏修叛徒集团鼓吹“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林彪说这“可作公式语”,又宣扬什么“以饵取鱼”,“以禄取人”,说来说去,无非都是“钱能通神”的新翻版而已。

从资产阶级的“钱能通神”走向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说明了资产阶级垃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在继续散发臭味和传播病菌，毒害着人们的肉体 and 心灵。如果我们嗅觉不灵，香臭不分，就难免上当受骗，甚至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跑自己还不知道。“货币是昨天的剥削残余”，今天它仍然是人们领取社会财富的凭证。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我们还不能一下子废除货币。只要“货币是领取社会财富的凭证，千百万小私有者紧紧地握住这张凭证，把它瞒过‘国家’的耳目，不相信任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做事就是为了拿钱”这样的资本主义道德，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就阻碍着人们自觉地从事无报酬的、没有任何规定定额的共产主义劳动。因此，我们在今天必须限制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中所体现出来的资产阶级法权，同“钱能通神”这种资产阶级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这是我们战胜资产阶级、反修防修的一项重要内容。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对所谓“钱神”发过一段深刻的议论：“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这是何等伟大的气魄！无产者为了获得整个世界，将粉碎一切锁链，不管这种锁链是黄金铸成的还是用钢铁铸成的。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经过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坚韧不拔的努力，彻底地持久地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直至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法权，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用黄金修建公共厕所的这一天是必将会到来的。到那时候，让“钱神”去守护公共厕所吧！



## 《方志敏》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5月初版

史锋编著的《方志敏》（《中国现代史丛书》的一种），最近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本书是一本传记性的通俗读物，它记叙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方志敏烈士的战斗的一生。方志敏烈士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认真学习马列著作，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方志敏在江西从事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在赣东北创建并发展了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方志敏始终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同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进行了不屈不挠

的斗争。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北上抗日途中，他不幸为敌人所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囚牢里，他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方志敏的一生，是勇敢地同阶级敌人和党内错误路线作斗争的一生，是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一生。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编写者曾深入赣东北老根据地访问调查，对烈士生平事迹进行了了解和核实，可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供广大工农兵、青少年读者阅读。

## 学理论不能等待

中华造船厂 高志仁

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引下，广大干部群众正在掀起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大家都在认真看书，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但是，也有些人出于不同的思想动机和目的，在那里等。

他们在等什么呢？

有的同志，是在“等上级布置”。理由呢，据说是“吃不准”。他们口头上一直叨念着“等一等”、“等一等”，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如果说等“布置”，毛主席对这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早已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按照毛主席指示去做，当前至少有两件事是可以抓紧做好的：一件是认真看书学习，一件是深入调查研究。不是说“吃不准”吗？“吃不准”正是反映了还没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好弄懂。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我们只有认真阅读，细心领会，才能真正弄清它的精神实质。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和著作，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真正能从理论上搞清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为什么对资产阶级要实行全面专政？社会主义社会中为什么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什么对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必要的限制，限制什么，以及怎样限制？等等，那我们的头脑就会清醒得多。而要做到这一点，马马虎虎学习是不行的，应当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用多年的时间认真学习，才能逐渐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现在那些消极等待的同志，一面说“吃不准”，一面又缺少那样认真学习的态度，什么都满足于看一遍、读一遍、听一遍，东拉西扯，不求甚解。如果问他几个为什么，对不起，答不出。这样下去，理论上稀里糊涂，行动上就永远只能是“吃不准”。

有些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同志也在那里等，他们这种等，反映了思想上的“怕”。怕什么呢？说到底无非是怕革命。这些同志应当严肃认真地想一想：自己为什么

会沾染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原因还不是放松了学习和改造，以致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丧失了警惕吗？今天认真地投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去，可以帮助自己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也是一次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好机会。有错误不要紧，只要改了就好。再说，所以会犯错误，无非是由于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学习的重要性。那些至今还在犹豫等待的人应当好好地重温毛主席的教导：“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毛主席的教导多么亲切、多么语重心长啊！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劝这些同志：还是跟上无产阶级革命的宏大队伍继续前进吧！

还有一种人也在那里等，他们的等与前两种人有本质上的不同。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分子都已本能地意识到这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他们来说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就象被抓住了一只手的小偷，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甚至听到“学习”两个字，他们也感到浑身不舒服，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此，他们或者在干部群众中制造谣言，歪曲这次学习的政治意义，妄图让城乡资本主义倾向、一部分人中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进一步泛滥，把社会秩序搞乱；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扰乱我们的步伐，妄图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以便混水摸鱼。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要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予以打击。对于干部和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影响，一定要多做思想政治工作，摆事实，讲道理，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这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无产阶级要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单位。资产阶级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则要千方百计地破坏这次学习。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同志应当积极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努力改造自己世界观，自觉地为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立场问题，也是衡量我们是要真心实意地反修防修还是半心半意甚至假心假意地反修防修的试金石。

毛主席曾经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



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今天，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高了亿万人民反修防修的自觉性，促进了全国的安定团结，共产主义的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在这样一个奋发向前的时代，我们每一个同志，都不应当停留，不应当等待，而必须加快前进的步伐，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 评“吃得开”

求新造船厂 章智明

在我们的队伍中，有这么一些被称为“吃得开”的人物。他们只需电话一挂，便条一开，招呼一打，许多在正常范围内不允许和不可能搞到的东西就都源源而来，“本事”可谓大矣！这种人的数量虽少，影响却很坏。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必须作阶级分析。“吃得开”就是一句浸透了资产阶级处世哲学的口头禅。这些人之所以“吃得开”，究其原因，无非是由于他们都精通一套资产阶级的歪门邪道。譬如：事情未办，礼物先行；或者是名曰“研究研究”，实为“烟酒烟酒”，等等。工人群众对此很气愤，说：“吃得开”原来就是靠“吃”来开路的。而我们的某些同志把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权力当成捞取私人好处的本钱，一吃就开门，越吃门越开，把金钱和礼物置于革命原则之上。这种不正派的作风，绝不是无产阶级的，是和我们党历来提倡的“老老实实地办事”的作风相违背的。如果这种“吃得开”就是“本事大”，那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本事”。

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是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本旨的。这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但是，那些自命为“吃得开”的人物，却往往把自己手里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资本。他们四出钻营，交朋友、拉关系，或者替人办事，目的是为了互通有无，搞庸俗的礼尚往来。“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你给我一点“好处”，我才给你一点“好处”；我现在给你一点“好处”，正是为了将来你给我更大的“好处”。如此互相利用，大家就都“吃得开”了。假若你拿不出什么可供“交换”，即使你困难重重，甚至是国家任务完不成，也

与我秋毫无关。这种信条，渗透了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的臭味。如果让它任意扩大和发展，甚至渗透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那人和人的关系不就统统浸入了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变成“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了吗？这种尔虞我诈、互相利用的“交换”，同我们今天发扬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是根本对立的。

“吃得开”之类的资产阶级东西今天还有一定的市场，这决不是偶然的。社会主义社会正象马克思所说，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还存在着旧社会的各种“痕迹”。而我们的有些同志，由于没有认真学习马、列，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非但不认为这种东西是丑恶的，反而认为这些人头子灵活，门路广，有办法，为他们的活动开“绿灯”。我们的有些领导干部，从单纯的任务观点出发，明知这些“吃得开”的行为中有不少是混水摸鱼、“捞一把”，但也因这种人“有办法”而眼开眼闭，放任自流，放弃了无产阶级的原则。这样一来，有人搞，有人“吃”，他们也就更加“吃得开”了。

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吃得开”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行为，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大的腐蚀作用。它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物资的计划供应，妨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忘记党的政策和原则，而“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温床的作用。列宁说：“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那末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看，“吃得开”原来就是资产阶级在开口“吃”社会主义制度，“吃”革命队伍中的一部分人，使他们堕落成新资产阶级分子和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引起警惕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今天，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正气正在压倒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那种“吃得开”的思想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抵制和批判。但是，阶级斗争是长期的，特别是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垃圾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的一切干部、一切同志都应当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在各项工作中，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和一切不良现象作坚决斗争。这样，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才能胜利地前进。

# 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专政

宫效闻

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基础。学一点政治经济学，搞清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对我们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很有帮助。

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是，阶级依然存在；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灭。这种状况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毛主席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都是由商品制度决定的；而商品制度的存在，又是由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两种公有制在一个长时期内同时并存，归根到底，又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所决定的。只要存在商品制度，就必然存在资产阶级。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新资产阶级分子还会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列宁曾经说过：“现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都同经济学问题有最直接的关系”，“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最紧要的问题，都是同经济问题密切联系着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列宁全集》第4卷，第33、36页）在社会主义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分析了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根源，讲了最重要的经济学问题。把经济学问题搞懂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就搞清楚了。搞清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那就会大大加深我们对“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

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

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既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商品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又分析了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能够存在和得以再产生的经济根源，还提出了无产阶级正确对待商品制度的路线和政策。要深入理解毛主席的指示，关键就是要懂得商品制度，懂得商品，懂得任何一件商品必然存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恩格斯在分析商品的矛盾的时候指出：“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正是由于商品内在矛盾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仍然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相统一的商品。在一定的条件下，商品内在矛盾的发展，也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制度，主要是建立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的，要受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调节和支配，而不完全由价值规律调节。因此，商品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已经得到了限制，与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的状况不同。但是，就商品的内在矛盾来说，就商品生产的基本经济规律即价值规律的作用来说，它总是要求摆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限制，自发地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在商品制度下，通行的是“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即等价交换的原则。这个原则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商品生产者就是利用这种形式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攫取大量的商品和货币，爬到资产阶级的地位上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那些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发展资本主义的人，也会千方百计地去攫取大量的商品和货币，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凡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无不竭力主张巩固、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刘少奇、林彪时而鼓吹“四大自由”、价值规律“万能”，时而鼓吹要“取消”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忽“左”忽右，目的都是为了妄图听任价值规律去调节商品生产，取消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从而进一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有些平部，过去为什么会跟着刘少奇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走，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这同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懂得商品有关。利润是价值的转化形态，利润挂帅就是价值规律“万能”的变种。物质刺激实质上就是商品刺激、货币刺激，它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之间的金钱关系。列宁指出：“没有领会和不能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商品经济的人，是不会有共产主义的。”无论是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学一点政治经济学，把商品制度弄懂弄通，至关重要。

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怎么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呢？这不

是偶然的現象。“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極少數新資產階級分子正是利用和擴大在分配和交換方面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占有越來越多的商品和貨幣。他們取得了对物的支配權力，也就取得了对人的支配權力。蘇聯蛻變為社會帝國主義的過程就是這樣。在那裡，一小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在取得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支配權力以後，迫使廣大工農重新淪為僱傭勞動者。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儘管同蘇聯的情況有着根本的區別，但也仍然還有一個領導權的問題。毛主席指出：“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裡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羣眾手里。”這種情況，應當引起我們極大的重視。

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並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而是在新的條件和形式下的繼續。資產階級法權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各個方面，在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各個環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是要從各方面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逐步造成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只有在一切領域、在革命發展的一切階段，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無產階級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這個重要的理論武器，學會識別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思潮。

毛主席教導我們：“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裡解放出來，變為羣眾手裡的尖銳武器。”政治經濟學也應當這樣。當前廣大羣眾和幹部為了弄通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正在選讀一些革命導師的政治經濟學著作，這值得大力提倡。多少年來，在一些經濟工作者中間，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部門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有着不小的市場。他們把政治經濟學單純歸結為研究生產、研究生產力的技術科學。儘管滿腦子生產數字（這並非不需要），但對生產關係、階級關係卻表現出驚人的“心中無數”。這種狀況是很危險的。列寧早就指出：“政治經濟學決不是研究‘生產’，而是研究人們在生產上的社會關係，生產的社會制度”（《列寧全集》第3卷，第42頁）。“研究政治經濟學不能隨便便”（《列寧全集》第4卷，第36頁）。我們必須遵循列寧的教導，在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同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部門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劃清界限，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理論武器，為堅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而戰鬥終生。

# 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上)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选载

**编者按：**本文是上海复旦大学等单位试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章。当前，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认真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包括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有关内容。本刊希望读者对本文积极提出意见，供作者作进一步的修改。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形成

###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基础

一个社会，在建立一定的所有制形式之后，发展同这种所有制形式相适应的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在研究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之后，有必要紧接着来研究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

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的。奴隶主所有制产生了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封建主所有制产生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资本家所有制产生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赤裸裸的不平等关系，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这是明明白白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同了，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往往同物结合着，并且被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了起来。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纷纷著书立说，在物和物的关系上大做文章，企图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人和人的关系的阶级对立实质。“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sup>①</sup>“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sup>②</sup>。这

<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4页。

<sup>②</sup>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3页。

样一来,整个经济学中最难的问题就豁然开朗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谋求生存。“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sup>①</sup>这就是在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的基础上强制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关系: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的阶级对立的关系。“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sup>②</sup>

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在用暴力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才产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使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地主、富农之间,在旧社会里那种被统治和统治的关系,颠倒过来了,一切剥削制度被否定了。这种颠倒,这种否定,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是一种经济上的强制力量,它使得剥削阶级丧失了剥削劳动人民的手段,迫使他们接受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他们的统治和改造。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则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人。这时,劳动已不再是资本剥削的对象,而成为每个社会成员所应享有的权利,成为光荣而又豪迈的事业。随着劳动性质的这种根本改变,人们在生产中相互交换活动,已不容资本插足其间,它的内容原则上就是相互交换劳动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sup>③</sup>。这种排除了剥削者而在劳动人民之间进行的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为劳动人民之间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为共同革命目标而斗争的同志关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着。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实行商品制度,人们相互交换劳动还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这里的平等权利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也仍然存在,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此外,资产阶级还力图用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雇佣关系和竞争关系,来腐蚀和破坏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人们相互关系。所以,人们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发展过程,不能不是共产主义因素同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的传统和痕迹之间的斗争过程。由于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劳动人民之间的新型关系还只能在阶级斗争的胜利进程中逐步地发展。

### 上层建筑在相互关系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相互关系的性质。但是,人们的相互关系,又总是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下发展的,是受一定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因此,在考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06页。

② 同上书,第629页。

③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察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时候,不能不联系社会的上层建筑进行研究。

在阶级存在的社会,上层建筑是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上层建筑一经形成,就积极地为它的经济基础服务,并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总是要利用上层建筑的力量,千方百计地保护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制,巩固和发展同它相适应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这是一般规律。

就拿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是运用上层建筑的力量来强行维护和扩大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关系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sup>①</sup>。十五世纪末叶至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发生的有名的“圈地运动”<sup>②</sup>,就是用暴力手段驱使大批的贫苦农民变为“象鸟一样自由”的无产者流入城市,为资本扩大了统治劳动的对象。但是,流入城市的农民往往宁可流浪,也不甘心接受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为着把破产的农民赶到工厂里去,英国资产阶级制定了惩罚流浪者的法律,使他们“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sup>③</sup>。看,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发展资本统治劳动这样一种相互关系,所用的手段是多么残暴啊!

资本统治劳动的关系依靠暴力得到维护,也要依靠暴力才能粉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果然被粉碎了。

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立起来,因此,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既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又必须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下形成和发展。如果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和发展,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中,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剥削阶级之间,是统治和被统治、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剥削者按照他们的阶级本性是不会接受这种相互关系的,因而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剥削阶级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为着实现对剥削阶级分子的改造,就必须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在劳动人民中,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逐步建立他们之间的同志式关系,则要不断地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作斗争,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00页。

② “圈地运动”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之一,以从十五世纪末叶开始在英国发生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当时,毛纺工业兴起,羊毛价格上涨,于是英国的地主和资本家互相勾结,用暴力把农民的耕地变为养羊的牧场。十八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炮制了一系列所谓“圈地法案”,利用资产阶级专政工具支持地主资本家对农民实行暴力剥夺。在这几百年中,农民不断反抗,发动了多次反对圈地的起义。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05页。



毛主席指出：“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sup>①</sup>因此，必须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中，用马克思主义去逐步战胜残留在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才能为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逐步形成和发展扫清道路。

总之，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两个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长过程。林彪竭力鼓吹什么“人和人的关系——专门利己”，“动物全凭掠夺，皆可师也”。他的同伙则宣扬什么“‘人人相待有如豺狼’，如不欺骗买卖不成交”。这伙叛徒所宣扬的，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的大鱼吃小鱼的利己主义的相互关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旧关系，破坏社会主义的新关系。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广大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要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就必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继续深入开展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灭资兴无，斗私批修。如果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会自然消灭，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会自然地建立起来，那就是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陷入了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样就会放纵资本主义势力的泛滥，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瓦解。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从反面教育我们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方面的科学真理。

### 相互关系的巨大能动作用

一定的相互关系是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相互关系具有很大的能动作用，它反作用于所有制，并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相互关系又共同决定着分配关系。

相互关系对生产关系其他两个方面的作用，在社会主义以前的历史时期中就表现得明白。例如，要使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分配关系得到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一定要维护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即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如果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对工人没有绝对的统治权力，如果他们不能强制工人按照资本家的意志来行动，听任资本家的摆布，那末，资本主义的剥削就无法实现，资本家所有制就无法巩固和发展。资产阶级是十分重视维护和巩固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以巩固和发展资本家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这种资本家统治和奴役工人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的基本内容，它在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确实促进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扩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分配关系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群众“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sup>②</sup>。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相互关系的历史，就是一部资产阶级残酷压迫、奴役、

<sup>①</sup> 转引自1967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sup>②</sup>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8页。

## 剥削广大工人的血泪斑斑的历史。

在旧中国,这一方面的史实真是成千成万。仅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例,这个公司的资本家和工人的相互关系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资本家除了依靠经理、厂长、监工、工头等监督、指挥工人的劳动之外,还专门雇有三十多个伪警察,实行野蛮的棍棒统治。伪警对工人抄身、殴打、关押,甚至用利斧砍杀。厂里订了各种限制工人自由的规章制度。1931年底修订的厂规第三十条规定:“违犯下列各款者,经查明实据后,即予开除或责令赔偿:一、违抗工厂命令,情节重大者;二、聚众殴斗、骚扰工场者;三、调戏妇女致碍工作者;四、偷窃公物;五、有意损坏公物价值在五元以上者;六、有意做坏出品,情节重大者;七、煽动工潮、破坏工作有据者;八、欺骗工值;九、虚报物价取利或串收暗佣;十、签到或投牌后,无故私自出外。”第三十一条还规定:“违犯下列各款者,分别轻重惩罚,其罚款由工金扣抵;如每月犯至四次者,应即开除:一、擅离职守,罚洋四角;二、迟到旷工,日工罚洋一角,月工罚洋二角;三、疏忽出品,按其轻重惩罚;四、瞌睡、坐卧,罚洋二角;五、吵闹喧哗,罚洋四角;六、侮辱同事,罚洋一元;七、随地涕唾,罚洋一角;八、忘记收牌、投牌,罚洋一角;九、忘记签字,罚洋二角;十、未放工前预停工作,罚洋二角。”从以上的条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本质。这个公司就是凭借对工人采取这种残酷压迫而榨取高额利润的。1914年和1915年的年剥削率(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分别为362%和404%,在1933年到1936年期间,年剥削率竟高达1000%以上。

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剥削和压迫劳动者的关系,要求按照社会主义原则逐步建立人们的相互关系。相互关系的变革是变革生产关系的重要环节。抓住这个环节,使之不断完善,对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分配关系,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很大意义。

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正确处理人们的相互关系,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有着重大的作用。如果人们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受到限制,那末,共产主义因素就会大大发扬,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比较有保证,社会主义所有制就比较巩固,分配关系也会趋向完善。反之,如果强化和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让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雇佣关系和竞争关系泛滥起来,那末,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分配关系就会受到损害,甚至蜕化变质。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原则逐步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不是局限在一个企业内部,而是涉及到各个企业、各个经济部门以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表现为它们在生产协作、产品交换、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的交流等多方面的交换活动。这种企业之间和部门之间的有领导、有计划的相互交换活动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

性的体现，它有利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经济部门的力量，有利于充分利用和挖掘经济潜力，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作用。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sup>①</sup>红军内的这种相互关系，成了当时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在推翻三大敌人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力量。革命的传统，实践的教育告诉我们，必须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十分重视相互关系问题，使这个问题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不断解决，以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为着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破除和消灭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传统和影响，不仅需要经济领域，而且需要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不断地开展灭资兴无的斗争。很明显，如果不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不斗争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逐步清除部分领导干部身上的“三风五气”<sup>②</sup>，不肃清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流毒，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就不能保持和巩固他们在生产中的统治地位，就不能有效地实行对剥削阶级的统治和改造，劳动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也不可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日益完善和发展。在我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巩固和发展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过程，固然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不断胜利的过程，同时也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不断胜利的过程。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在政治思想领域深入展开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不但批判了敌人，同时也教育了干部和群众，大张了无产阶级正气，大刹了资产阶级歪风，推动着人们的相互关系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向前发展。

生产关系是决定社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必然要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当然，资产阶级对于丧失其社会生产中的统治地位是不甘心的。他们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般不敢公开地直接地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更多的是通过篡夺企业的领导权去不断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改变人们的相互关系，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目的。而无产阶级则要运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思想力量制服资产阶级的这种图谋，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①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64页。

② “三风”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五气”指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

# “公事公办”

——发生在凤城大队的故事

宋 兴 峰

有一次，凤城大队的干部接待了外地来的几位人民公社社员。这个公社为了发展中草药生产，需要粪缸底的厩脚做肥料。大队干部热情地为他们安排食宿，用拖拉机为他们运送厩脚，最后只收了一点柴油费。那几个社员很感动，先后给大队干部送来了猪油和豆油表示感谢。可是，这个大队的干部却说：“我们都是人民公社，相互协作和支援是应该的。送礼是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共产党办事不兴这一套。”说服对方把猪油和豆油拿回去了。社员们说：“我侬大队的干部就是‘硬’，公事公办！”

“公事公办”，即按社会主义的原则办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凤城大队的党支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公事公办，领导着广大社员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下面讲的，就是发生在这个大队的一些故事。

## 心要放在社会主义上

凤城大队是宝山县五角场公社的一个蔬菜大队，每年都种不少花菜。花菜叶子是喂猪的好饲料，按规定只能卖给单位，以利于发展集体养猪事业。有一次，附近公社的几个农民到凤一生产队来买花菜叶子，要求“通融”一下，并愿意出一元五角或两元一担。这个价钱比规定价格高出两三倍，卖不卖呢？大队党支部委员老俞对来说：“花菜叶子我们是有的，一担只要五角钱，但要集体开证明来。卖给私人，不要说两元钱一担，价钱再高也不卖。”

生意没做成，那几个农民只好骑着自行车走了。

这桩买卖没做成，事后社员们议论纷纷。大多数社员认为干部们“公事公办”做得对，但也有人风言风语，“送到嘴边的肥肉不吃，真是‘寿头’”；“一个要买，一个要卖，这有什么不对？”大队党支部听了这些议论后，觉察到这些议论中反映了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苗子。因此，他们抓住这件事反复进行了教育，使大家看到，一个要买、一个要卖，看来似乎合情合理，但从政治上看，如果只顾眼前多卖一点钱，助长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那就是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忘记了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的根本利益。这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事是无论如何都干不得的。因此，这几年来，这个大队虽然每年都有上千担的花菜叶子出售，但都坚决按照公事公办的原则，以五角一担的价钱卖给兄弟公社和大队，支援了集体养猪事业的发展。

公事公办，这就是说心要放在社会主义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大队由于花菜价钱高，管理方便，大队百分之七十的耕地都种了花菜。因为品种单一，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消费者有意见，说：“花菜虽然好，但是天天吃花菜，我们吃不消。”文化大革命后，他们打破了那种“看价种菜，看价上市”的资本主义老规矩，坚决按照国家计划安排各个品种的种植面积。现在花菜种植面积只占耕地的百分之四十二，并且大力发展了土豆等国家提倡发展的品种，保证了蔬菜的均衡上市。他们不是把发展蔬菜生产看成是简单的商品买卖关系，而是把它作为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加强工农联盟的一件大事，从而使价值规律的作用进一步受到了限制。

### 冲破小生产者的“巴掌山”

在发展农业生产中要坚持“公事公办”，在领导队办工业中，同样也有一个是否坚决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后，国家征用了凤城大队的一些土地，有关工厂打算下放一些产品给大队加工。当时有两个项目：一是五金加工业务，收入多，每人每天的加工收入有二、三十元，但技术要求高，需要挑选青壮年劳动力来办；另一个是纸品加工业务，收入少，每人每天的加工收入只有二、三元，但技术要求不高，老弱病残的社员都可以做。

是办加工收入高的五金加工组，还是办加工收入低的纸品加工组？在大队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开始，有人一听说搞五金加工“油水大”，心就动了，主张马上挑选有文化的青壮年进厂学技术。但是，很多社员不同意。他们说：“我们队强劳动力已经不足，如果让年纪轻的都办小工业去了，谁来种地？”“我们办工业，是单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发展农业办工业？”党支部支持了后一种意见，在发动大家讨论后，决定放弃收入高的五金加工，办收入低的纸品加工，把一些老弱病残的社员吸收进来，让他们也能为社会主义出一把力。

这件事决定后，大队里还有人有不同看法，说：“不多赚钱，集体经济怎么能壮大呢？”党支部就耐心地教育部分落后的社员群众，指出：我们办大队小工业，要想到国家的大工业，决不能被“巴掌山”挡住眼睛，搞利润挂帅，重钱轻农，削弱农业。以后，他们根据同样原则，又陆续办起了其他几个加工组。目前，大队务工社员的平均年龄是四十七岁，五十岁以上的占百分之八十。这样做，既不影响农业，又增加了集体收入，而且使一些老弱病残的社员充分发挥了作用。

## 不给不正之风开“通行证”

去年，有个生产队的干部到大队来要求开一张证明。这个干部通过“后门”的关系，准备从市里一家废品商店中买一部分废钢筋造房子，要大队出具证明用集体名义去买。大队干部想：供应单位的东西如果让私人去买，那就要冲击国家计划，这个“门”不能开。他们对这个干部进行了教育，坚决不出证明。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好几起。有人说：社员买一点废钢材，一不要大队出钱，二不要大队讲情，不过要大队盖个图章，出张证明，何必这样顶真？大队干部说：贫下中农把我们推选出来，是要我们掌好印，把好关，领导大家搞社会主义。社员生活应该关心，但决不能讲资产阶级的人情，决不能“私事公办”。

凤城大队的党支部，对大队内的不正之风敢于“卡”，对社会上的资本主义歪风也敢于“顶”。去年有个工厂征用了大队一些土地，根据协议，由这个厂支援大队一些建筑材料盖猪棚，手续也由县里批准办好了。这时，这个厂的两个经办同志却主动提出，要大队多向厂里申请六百公斤螺纹钢，但有一个条件：在这六百公斤螺纹钢中，要让给他们两百公斤。凤城大队党支部认为，这是不正之风，必须坚决抵制。虽然，当时也有个别同志担心：由于支援大队的权力操在那两个同志手里，如果不这样做，以后遇到事情不好办；可是他们还是一致决定，决不从小集体的利益打主意，要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办事；即使因此把“关系”搞坏了，宁可猪棚不造，也要坚决顶住。他们顶得对，顶得好；把这股歪风顶回去了。

## 干部以身作则

“打铁先得腰板硬”。凤城大队的干部所以能做到公事公办，是因为他们对自己要求严格，以身作则，不谋私利。他们说：我们当干部的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决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利。

这些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不少社员盖起了新楼房。党支部副书记老王一家五口还挤在一间普通瓦房里。社员们关心地说：“老王，你家房子也该往上升啦（即翻楼房）！”前年夏天，有家钢铁厂的干部到大队来联系工作，发觉老王家房子比较挤，也劝他把房子翻一下。隔了半年多，这个同志打来电话，说厂里正好有一批废钢筋要处理，他已代老王买了一些，要他去取。老王对于同志们的关心，是感激的。但他想到有些社员家的住房更挤，自己是个干部，一事当前，不能先替自己打算。他就把这事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并建议把材料转给大队，帮助住房更加困难的社员。

在凤城大队党支部，这样的例子并不是个别的。几年来，国家和工厂分配和支援大队不少水泥、木材和废钢材等物资，他们都把它用在集体事业上，先后为七个生产队修建了四千五百平方米的猪棚和两个仓库。党支部六个委员，从未拿过公家的一砖一木。在人员安排上，他们也是公事公办，不徇私情。有个大队干部的岳母想进队办企业工作，她和她的女儿几次要求这个大队干部想办法。这个干部对她们说：进队办企业要按条件，由群

众评议,该谁去,谁就去。共产党员、大队赤脚医生小王,风里来,雨里去,几年来诊治的病人有五千多人次。有些有病的社员看她辛苦,常常给她送一点糖果、土产等东西。可是小王都一一谢绝,从不接受人家的礼物。她说:“我是贫下中农培养出来的赤脚医生,为贫下中农治病是我的责任,决不能把技术作为私有,用来搞个人交易。”

## 学懂一点,做到一点

“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变修。”凤城大队党支部的同志讲起了这样一件事:一九六六年“四清”运动以后,一个在运动中表现较好的女青年被选进了大队党支部的领导班子。这个同志出身工人家庭,根子正,年纪轻,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可是,她当了干部以后,由于放松了思想改造,经受不住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袭击,被商品、货币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赶“时髦”,讲排场,思想上一步步向邪路上滑。没有钱花,就利用兼任生产队会计的职权,从小额挪用到大笔贪污,终于跌进了资本主义的泥坑。这件事在党支部领导班子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使他们清醒地看到:光凭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不行的。如果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丧失警惕,不注意学习,不加强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即使出身于工人或贫下中农家庭,同样有被资产阶级吃掉的可能。因此,这些年来,支部一班人坚持看书学习,联系实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学懂一点,做到一点,努力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

一九七三年,一位担任党支部副书记的新干部从吴淞镇上买回来四只人造革的软椅子。支部的老同志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就主动找这位新干部谈心,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严肃地对他说:“有了软椅子,不能忘了木凳子,穿了的确良,不能忘了布衣裳。贫下中农有的东西,我们可以有;贫下中农还没有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先有。千万别小看了这几张椅子!”

开始,这位新干部思想一下转不过弯来,说:“我一不贪污,是劳动所得买的;二不开后门,商店里大家都好买,有什么不对?”

这个老干部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共产党是干革命的,不是图享受的。思想上、工作上要高标准,生活上可要低标准,决不能丢掉贫下中农艰苦朴素的好传统。如果家里搞得很阔气,贫下中农就不会进你的门槛;身上穿得‘的上的下’(指用的确良制作的上下装),就不能和群众一起坐在地上。”这番话使这个新干部触动很大。最近,他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进一步体会到,我们现在还生活在商品、货币的环境中,在分配和交换方面,都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如果放松思想改造,那就会被花花绿绿的商品世界迷住心窍,走到邪路上去。

战胜千百万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凤城大队党支部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带头人,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干部和社员,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产生资产阶级土壤的斗争进行到底,不断扩大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 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史研究

## 抗战时期的一本革命三字经

吴 乾 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我党开辟的根据地和解放区,为了推行识字教育,并通过它向群众宣传党的基本方针政策,以三个字一句的韵语体裁,出版过多种三字经。陕甘宁边区出版的绘图《新三字经》便是其中的一种,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其他抗日根据地曾广泛地翻印发行,受到了广大军民的欢迎。它是对地主阶级长期宣扬孔孟之道的《三字经》的直接否定。

这本《新三字经》一上来就给我们以很深的感染。它的封面上印着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一手拿锄、一手拿枪的图景,洋溢着军民团结,一面打仗,一面生产,决心战胜困难,赶走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革命精神。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建国之初教导我们说:“全国一切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三字经》上的这一历史画面,就是当年“艰苦奋斗”的见证。

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妄图灭亡中国的时候,谁能领导中国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谁就是人民的救星。《新三字经》一开头就表达了人民的这种心愿:

“陕甘宁,边区好。共产党,来领导。

咱领袖,毛主席,能救国,能抗日。”

书中随着又写道:

“共产党,八路军,是咱们,好救星。”

还在第一页前几句话的上面,印着毛主席的画像,画像右边写着“人民救星毛主席像”。当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正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肩负抗日救国的重任,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党中央一直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延安成为全国抗日的灯塔,陕甘宁边区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陕甘宁,边区好”六个字,恰好地反映了革命人民对延安、对陕甘宁边区的无限向往。《新三字经》的这些话,同那时陕北人民歌唱的“毛主席,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一样,表达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大大地坚定了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新三字经》用了比较多的篇幅,宣传了毛主席“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方针。在抗



日战争的中、后期，日本帝国主义把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残酷的“三光”政策；同时，国民党顽固派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对“边区”和根据地重重封锁，隔断同外界的交通，一切物资都进不来，还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使“边区”和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毛主席针对这种情况说：“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党中央指出了这个困难，叫我们提起注意绕过这个暗礁。”因此，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就成了坚持抗战、发展胜利的头等大事。《新三字经》列举了生产劳动的内容和方法，不只是为了适应“边区”劳动群众的需要，更是和大生产运动的战斗任务紧密联系的。晋察冀边区政府在这个阶段编写的小学国语课本，有关劳动观点、生产知识的内容也占到了百分之三十七。这里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一切文化教育都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革命的政治服务。

发展生产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方针。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新三字经》进而宣传了这个方针：

“组织起，搞生产。办教育，助抗战。

男人耕，女人织。又丰衣，又足食。”

按照毛主席制订的方针，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幼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既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也是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这样，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在抗日根据地主要是把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是改造封建农村经济迈出的第一步。它有“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社”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每个单位的人数从几个人、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有全劳动力组成的，又有半劳动力参加，有用人力实行互助的，也有用畜力或工具实行互助的。除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外，还有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以及工业合作社。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毛主席和我们党综合了群众的经验和要求，加以提倡，成为大生产运动中最主要的组织形式。《新三字经》用通俗的语言显示出它的生命力说：“变工队，组织好。都上坡，去除草。”“合作社，入股全。都有利，好经营。”因为有了集体互助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打破千百年来的陈规陋习，改进劳作方法，推广先进经验，是发展生产的又一重要措施。“不把陕甘宁边区一些农业劳动英雄的模范劳动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锄多上粪）推行于各地，而说这些方法不能在某些根据地推行的观点，是错误的。”《新三字经》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认真地介绍农业生产上的改进方法说：

“挖得深，锄得细。多拾粪，来上地。

棉花里，撒芝麻。玉米旁，带豆荚。

西葫芦，苗子白。香甜瓜，和荞麦。”

《新三字经》还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劳动精神。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边区”的男女老幼“组织起，搞生产”，他们不计较一身一家的报酬，更没有想要得到哪一级工资，为了“助抗战”，保卫革命根据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他们夜以继日地战斗在“边区”。八路军英雄们更以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投入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三五九旅指战员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造成了“五谷丰，青草长”的“陕北好江南”。正是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创造出了人间奇迹。

在这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大战斗中，“边区”人民的革命精神从其他方面也表现出来。《新三字经》讲了这样一桩事情：两个儿童，“晌午前，在哨地。盘查出，一杆烟。”区长向上级报告，“请县长，把奖给。”家长和儿童的态度却是：“我教娃，要牢记。保边区，人人事。应尽责，勿大意。奖不奖，没关系。娃答应，记得清。”这里说的是群众识大体，顾大局，做了该做的事，不指望有什么奖赏。这就用群众的先进事例教育了群众，使群众的革命精神更加得到发扬。

大生产运动是一所大学校，不仅提高了广大军民的思想觉悟，也改造了社会上的懒汉和游民分子。“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新三字经》中讲了一个名叫张兴的人的转变过程：“有张兴，懒做事。串门子，不务正。”在革命群众的影响下，经过说服教育，他“订计划，搞生产。开荒地，五垧半。”努力参加劳动生产，增加了粮食，改造了思想。“秋季到，收成好，把张兴，喜极了。交公粮，送得早。”张兴的改邪归正，破私立公，为这些人做出了榜样。

《新三字经》所说的这些事实，反映了“边区”军民战胜困难、奋发图强的兴旺景象。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上交革命政府的公粮也步步增长。拿陕甘宁边区来说，一九四〇年是九万担，到一九四二年就增加为十六万担。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供给这么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革命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懂得为了抗日和建国，支援政府是必须的，把这种负担当作无上的光荣。但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却以“关心”群众生活为名，企图扼杀群众的革命精神，扯起孔老二的破旗，要政府施行什么“仁政”。毛主席批判这种错误论调说：“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真仁政。”

《新三字经》的全部内容，是宣传抗日救国，提倡生产劳动，把开荒种地看作革命大事，从根本上批判了旧《三字经》轻视劳动、宣扬读书做官等谬论，把孔孟之道踩在脚下，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新三字经》虽然只是一种普通的识字课本，但它产生于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直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人民艰苦奋斗的历程，读了，对我们发扬革命传统很有帮助。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加速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步伐。而《新三字经》给我们唤起的就是这样的热情和精神。

# 评黑格尔对孔学的批判

上海汽轮机厂 郭哲祖

黑格尔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有着明显的反孔倾向。研究黑格尔是怎样反孔的，这对于我们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批林批孔的斗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一)

黑格尔对孔老是极其蔑视的。他说，在孔老二的思想中“含有一种反复申说，一种反省和迂回性，使得它不能出于平凡以上”（《历史哲学》179页）。在黑格尔的著作中，类似这种对孔老二的嘲笑是很多的。他还这样说过：“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每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哲学史讲演录》119页）黑格尔这里说的“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谈话”，就是被中国的反动统治者狂热吹捧为“圣书”的《论语》，他断言这样的书不翻译倒比翻译好，这真是对孔老二绝妙的讽刺。

黑格尔如此蔑视孔学，是有其道理的。首先，他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孔学，发现其中完全是些过时的东西。黑格尔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运动着的，发展也决不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而是有上升有前进的运动，是“一种达到更完善，更完美的境界的进展”（《历史哲学》94页）。因此，新的东西总是要代替旧的东西，比较完美的东西总是要代替已经腐朽了的东西，世界的发展有着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黑格尔正是从这种发展的观点出发，驳斥了那种妄想复古的谬论。他指出，如果我们在近代，谁想要提倡回复到古代哲学观点，“这也是不可能的，甚至是极愚蠢的事，就好象一个成年人费尽气力要想退回到青年，青年要想回复到童年或婴儿时期一样。”（《哲学史讲演录》49页）黑格尔以这样的观点来分析孔学，他指出，“孔子的道德教训所包含的义务都是在古代就已经说出来的，孔子不过加以综合。”（《哲学史讲演录》126页）这里黑格尔看到了孔学的腐朽性。在历史的发展上，哲学总是同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同“旧国家的没落和新国家的

兴起也是同时并存的”。孔老二在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把殷周奴隶制的典章制度和反动文化加以综合，提出一套反动的儒学，妄图维护行将灭亡的奴隶主统治，开历史的倒车。孔老二自我表白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充分说明了孔学是与没落的殷周奴隶制结合在一块的。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狂热地鼓吹复礼、复辟，反对前进，反对发展，这和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的辩证观点在本质上是对立的。

这种对立，我们还可以从他们不同的善恶观上来看。孔老二主张“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鼓吹“仁者爱人”。孟轲也炮制什么“性善论”，妄图要人们放弃对旧世界、旧制度的斗争。但是，黑格尔却说：“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转引自《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他认为，“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目的却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源泉”（《历史哲学》59页）。把“恶”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尽管也是唯心的，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性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列宁也认为，黑格尔关于恶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论述“接近历史唯物主义”。黑格尔宣传“恶”的作用，孔老二宣扬“善”的作用，一个要革新，一个要倒退，两者的对立是清清楚楚的。

其次，黑格尔对孔学的“天人感应”论和中国封建社会的“神权政治”也十分反感。他曾经提醒那些研究东方和中国社会制度的人们：在观察这种社会制度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到神权政治的形式”。所谓“神权政治”，就是以反动的“天人感应”论为理论基础的统治手段。黑格尔在著述中说：凡是生活中偶然的机<sub>会</sub>，以及自然界各种事物必然的内在联系，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都企图用“天意”来解释或实现，“人与天的关系也是这样想象的。百姓和皇帝的行为善良，可以得福，假如多行不义，就会招致各种的灾祸。”（《历史哲学》175页）他认为，这种“想象”，充满了“巫术”成份，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宗教迷信。他还特别指出，孔学完全是同这种“天人感应”论结合在一起的。事实正是如此。孔老二竭力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炮制了一套“天人合一”的谬论。孔老二死后，他的信徒和历代反动儒生又不断加以因袭，演化，为它添彩加色，充实完善。到了汉朝的董仲舒，更捏造了一个“人副天数”的谎言，把人身上的骨节、五脏、四肢的数目，比附为一年的日数、月数，以至五行、四时之数。还说什么：“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责之”，把国家的兴亡，灾害的现灭，都说成是由“天”来安排的。黑格尔在剖析这种宗教的政治作用时说：“对于‘天’的关系，通常总同皇帝本人相连，同时他又操持着‘天’的各种专责。”（《历史哲学》175页）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散布的“天人感应”论，是为了推行其“君权神授”的反动政治纲领，使大地主阶级专政神圣化。这一点，黑格尔看得准，看得对。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帝成了“天”在

世上的化身，只有他才能接受“天意”，只有他才能摆脱各种世俗的拘束。所以，黑格尔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只有皇帝一人是自由的”（《哲学史讲演录》）。

黑格尔还看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束缚人民的手脚，还制造了一种社会道德，这种道德就是孔老二反复鼓吹的礼教。孔老二曾竭力叫嚣，“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强用周礼来框划人的言行和思想，推行了一套有利于奴隶主阶级统治的“仁义之道”。黑格尔从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强调人的“个性自由”，“个性解放”，故而对孔学中那种束缚人的自由的道德十分厌恶，他指责这种道德是“压制人主观自由的法律”，贬责孔老二及其信徒关于道德方面的著述，“读时就好像一批命令”（《历史哲学》112页）。他把孔学的道德观的反动作用，归结为两个方面，首先就是孔学所提倡的忠恕、孝悌、三纲五常直接控制了人民的家庭，“家庭的义务具有绝对的拘束力，而且是被法律订入和规定的。”（《历史哲学》166页）这种“家庭的义务”，就是孔老二所鼓吹的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的忠孝节义。封建统治阶级不仅提倡这种道德，而且被视如法律，一旦僭越或违背这种道德，就将受到各种刑罚的惩处。黑格尔指控充满杀机和血腥的礼教，“几乎等于一种奴隶制度”。他还更深一步地看到，孔学的礼教作用于人民的家庭是次要的，主要是用来维护封建统治，使中国成为“以家族关系为基础的——一个父道的政府”。在这个“大家庭”里，皇帝就能“象严父那样行使他的权限”（《历史哲学》167页）。黑格尔把这种社会制度称为“大家长制度”，从中央到郡县整个封建统治政体，就象一个有父、子、孙等几辈人的家庭一样，长辈对下辈有绝对权威，下辈不得违抗长辈。在这种“父道的政府”里，统治阶级迫使人民必须象儿子顺从父亲那样听从皇帝的朝纲，因为这朝纲就是家庭中严厉的家规。如果人民稍有不满意，便可判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就将受到“道德”的惩罚。所以，黑格尔认为，以礼教为基础的封建政体“只是一种（僵化了的）自然秩序”（《哲学史讲演录》97页）。

黑格尔尽管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很不全面，但在批判孔学的同时，却对秦始皇所采取的一系列革命的措施给予了同情和肯定。他在介绍中国的历史时，特别指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称赞秦始皇建筑长城来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侵入，“一向被认为是一种惊人的成就”。在谈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他指出：秦始皇“特别要消灭书经”，而“保留与他自己统治与农、医学有关的书籍，不予焚毁”。他这样做，“为的是要打算把以前各个朝代的记忆都消灭掉，他自己的社稷因此可以更加巩固起来”（《历史哲学》164页）。黑格尔的这些话，肯定了秦始皇厚今薄古的革命事业，采取了贬孔褒秦的态度，这在当时的欧洲是很可贵的。

## （二）

黑格尔反孔有其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

黑格尔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欧洲。当时的欧洲，正处在一个天翻地覆的社会大变动时代。封建制度已经陷于土崩瓦解之中，新兴的资产阶级正在起来革命，推翻没落的封建制度，夺取政权。在这同时，黑格尔所在的德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蓬勃兴起，城市中手工业帮工暴动，资产阶级要求废除贵族和教士们的封建特权，要求参加政权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但是反动派是决不甘心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各国的封建君主们以种种手段妄想维护腐朽的旧制度，搞复辟、倒退，向革命势力反扑。在这当中，他们也从中国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寻找思想武器。

孔孟之道，流传到欧洲，开始是和殖民主义者对我国的侵略、掠夺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在侵略活动中发现孔孟之道不仅是侵略中国的“敲门砖”，并且与他们自己的反动宗教思想基本上是一路货。于是这帮殖民侵略者穿起了中国衣服，念起四书五经，并把一些儒家的书，按自己的意思翻译成外文，寄回国内，还开展什么讨论、辩论，吹吹打打，掀起了一股尊孔的浪潮。荒淫无耻的法王路易十五，在国内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对外侵略战争接连失败的时候，一七五六年，模仿孔孟所鼓吹的周朝奴隶主贵族的祭祀典礼，也“亲耕籍田”，举行什么春耕仪式，妄图以此来转移人民斗争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

在这股尊孔浪潮的冲击下，就连当时的一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也受了影响。由于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受其本身唯心史观和阶级的局限，当他们读了那些由传教士润饰过的孔学以后，就对其中一些似乎是超阶级的道德说教感到兴趣，摘录其中的片言只语，赋予资产阶级的新内容，并加以利用。当然，当时他们当中也有不这样做的，如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就对孔子抱有怀疑和贬视的态度，他们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使黑格尔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黑格尔为什么要反对孔学？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从自己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立场出发，本能地意识到孔学的反动阶级内容。黑格尔在谈到中国哲学的时候，首先就警告人们，要注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欧洲的政治制度在内容方面的不同。他指出：在人们“把东方的形式和我们的平行并列，或者还更爱好东方形式时，内容不同这一点，在作这类的比较时，是值得普遍注意的。”（《哲学史讲演录》119页）那末，在黑格尔看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内容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以“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为基础的“君主专制政体”。黑格尔这里所讲的“君主专制”、“主人与奴隶的关系”等等，指的就是当时中国的封建制。黑格尔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对这样的封建制是十分仇视的。这样的国家制度和黑格尔所向往的资产阶级能在其中有所发展的国家制度，当然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的。而孔老二的哲学却是这种国家制度的哲学，构成其“教育、文化和实际活动的基础”（《哲学史讲演录》125页）。既然黑格尔看到孔学是这么一种货色，自然要对之采取批判的态度。

### （三）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德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软弱性和两面性的阶级，它

一方面对封建的统治怀有不满的情绪,要求革命;另一方面,由于“它兴盛的时期,正是欧洲其他国家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开始衰败的时期”,它被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尖锐的对立和斗争吓破了胆。因此,它不敢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相反,却跪倒在封建统治阶级的脚下,通过改良的方法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

黑格尔的哲学正是这样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妥协性和两面性。虽然黑格尔本人在谈论外国时比谈本国要大胆些,但他的阶级本性使他即使是在批判中国孔学的时候,也不能不带上一根德国资产阶级庸人的辫子。在这里,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与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之间的矛盾仍十分突出。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他所谓的历史,并不是物质世界的运动,只是“绝对精神”的外在化,而“绝对精神”最终要把自己表现完毕,这样,黑格尔就不得不给自己哲学中的历史找一个发展的终点,那就是普鲁士王国。并且他认为,历史正是由它的“幼儿”状态——中国发展到它的顶峰——普鲁士王国的。因此,他在反孔的时候便掺入了浓厚的“地理转移论”和“日尔曼中心论”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色彩。这,一方面使他的发展的观点不能贯彻到底,另一方面又使得他的反孔的正确思想大为减色。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还往往使他从有没有“思辨的哲学”出发来测度孔学。例如,他在谈到孔孟之道的“天人感应论”时,能够揭露并批判“天人感应论”中的“巫术成份”,而不可能进一步追究出这种理论的根源,即上帝创世说。这是因为黑格尔自身正是这种学说的虔诚的信徒,他的“绝对精神”从本质上来看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哲学化了的上帝。因此,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来批判孔孟之道的“天人感应论”,那是无论如何也批不深刻的。

此外,黑格尔曾从要求“个性解放”的角度来批判孔学中压抑“自由意志”的道德观,然而黑格尔的“个性解放”却是十分虚伪的。实际上,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一向奴颜婢膝的特性,使黑格尔十分推崇普鲁士的封建等级制度,甚至把这种贵族等级看成是“王位和社会的支柱”(《法哲学》325页)。因此,他在批判孔学的三纲五常的同时,也流露出了对君臣父子等级观念的欣赏,声称这里包含有很多“优良的东西”。

总之,黑格尔是站在德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孔的,他的反孔有着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尽管如此,这些局限性并不能淹没黑格尔反孔的光彩,正如恩格斯在谈到黑格尔由于“体系”的需要而常常不得不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时指出的:“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前面,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的价值”。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黑格尔哲学中的反孔倾向,剔除糟粕,取其精华,是能够得到很多教益的。

## 《秦献记》和《秦政记》的写作年代

沈 澐

章太炎所写的《秦献记》和《秦政记》，肯定焚书坑儒，赞颂秦始皇的“法治”，是两篇旗帜鲜明、立论严谨的好文章。但是，这两篇文章的写作年代却至今尚值得商榷。

我在写《从尊儒反法到尊孔读经》一文（发表于《学习与批判》一九七三年第三期）的时候，认为这两篇文章写于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文章的本旨是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后来，该文经修改后在《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我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就上述看法作了订正，说明《秦献记》写于一九〇一年，《秦政记》是“在差不多期间写成的”。

最近，我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该馆收藏的这两篇文章的章太炎手稿，发现上述说法仍不够正确。我们查阅的结果，《秦献记》手稿有两份。一份题目下面注有“辛丑”二字，辛丑即一九〇一年。一九〇八年章太炎自己编定的《太炎集》编年目录手稿中，“辛丑文”项下列有《秦献记》一题，当即指此文。这份手稿的笔迹，与一九〇一年前后章太炎其他手稿笔迹相近。从这些情况可以断定，这份手稿确实写于一九〇一年。但这份手稿内容，与今天人们所熟悉的《章氏丛书·太炎文录》中所收的《秦献记》一文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而与一九一四年四月《雅言》杂志第六期上所发表的《秦献记》一文则相同。

《秦献记》的另一份手稿，内容与今《章氏丛书·太炎文录》所收者相同，题目下未注明写作年代，而注有“故事部”三字。《秦政记》手稿只有一份，题目下也没有注明写作年代，而注有“学术流别部”字样，“部”字只写了一半，这五个字就被涂去，改注成与《秦献记》题目下相同的“故事部”三字。一九〇八年编的《太炎集》编年目录手稿中，直到“戊申文”即一九〇八年项目下，都未提到《秦政记》，也未提及《秦献记》的第二份手稿。看这两份手稿的笔迹，与一九〇一年手稿笔迹亦有显著不同，而与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前章太炎在东京讲学时手稿笔迹相近。据此，可以断定，这两份手稿的写作，不会早于一九〇八年。

查上海图书馆所收藏的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在东京出版的《学林》杂志，分“名言部”、“制度部”、“学术流别部”、“故事部”等栏目。按照《学林简章》的解释，“自经籍及后代诸史所记事迹有所考证”，皆登载于“故事部”。《学林》杂志第二册“故事部”一栏，发表了两篇文章，正是《秦政记》和《秦献记》，内容和注有“故事部”三字的《秦政记》、《秦献记》手稿相同。由此可以断定，这两份手稿就是应《学林》发表的要求而写的，写作时间应在一



九〇九年至一九一〇年间。

《秦献记》两份手稿的主要不同之处，是在该文最后一大段。一九〇一年的手稿，亦即《雅言》所发表的稿子，强调了李斯“之奉法，不能坚牢如卫鞅也”，批评了李斯“令始皇始自称朕，后自称真人，微行咸阳。皆尽诛石旁居人。至于徐市、卢生之徒，妄妖求仙，荧惑主听，皆不能以法裁制”，说明正是由于李斯“侵越宪度”，没有始终坚持法治，才使那些反动儒生气焰嚣张，活动猖獗。他写道：“斯特以法令为文具，诏版既下，终不钩考以致其必行，故零陵令与斯辩难，成公生乃奸说其子，著书自见，一切无所穷治。”对于李斯没有严格实行对反动儒生的专政，表现了明显的不满。《学林》所发表的《秦献记》中，这一段被删掉了，替代的一段，则强调了“烧书者，本秦旧制，不始李斯，自斯始旁及因国耳”。并着重说明了“秦之诸王，非能如李斯知六艺之归也”。另一方面，则反复申述“文学辩慧，酰于人心，上下所周好，虽著令弗能夺也”。“今始皇不起白屋，而斯受学孙卿，好文过于余主。此则令之之谏、零陵之难、成公之说，一切无所穷治，自其分也”。在这里，章太炎对秦始皇、李斯没有始终坚持镇压那些反动儒生，表示了同情和谅解。《秦献记》两份手稿的这个变化显然是很重要的，反映了章太炎这十年间思想的发展与转变，也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刚刚登上政治舞台时，充满着革命的锐气，到武昌起义爆发前夕，这种锐气已大大削弱了。但是，章太炎于一九一四年将《秦献记》按照一九〇一年的原稿重新发表，又可说是有力地回击了当时复辟派分子借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名以攻击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逆流，是一次革命的行动。这一行动本身说明：辛亥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使章太炎进一步深切地认识到秦王朝没有坚决摧毁反革命复辟势力所带来的危害性。由此可见，搞清楚这两篇文章的写作年代和发表年代，对于进一步了解章太炎的思想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 《论儒法斗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初版

《论儒法斗争》（《学习与批判》丛书的一种），已于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本书共收有罗思鼎等人的四十七篇文章，除部分发表于《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外，大多数刊登于《学习与批判》杂志。这些文章都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写成的，内容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论述先秦以来的儒法

斗争，二是批判《三字经》等孔孟之道黑货，三是关于鲁迅批孔斗争的历史经验。这些文章批判了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思想根源，对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作了探讨，可供今天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参考。

## 关于荀彧的死和他的政治倾向

编辑同志：

读了你刊一九七四年第七期刊登的《论曹操的尊法反儒》一文，很受启发。文章叙述了曹操一生中坚决实行法家路线的历史，基本是正确的。但我认为，关于荀彧的一段还值得研究。荀彧的主要倾向是法家思想，而不是儒家思想，更不是曹操“逼死”的。看一个人要看他的全部历史活动，不能只看一事一时，对荀彧说过的一些话也要全面分析。下面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一、荀彧弃袁奔曹，表明了他的法家立场。

袁绍是河北最大的豪强，是当时儒家势力最顽固的代表。他“待彧以上宾之礼”，而彧却“去绍从太祖（曹操）”。（《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以下凡引文不注明出处者皆同此）荀彧在投奔曹操后，提出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策略，还引用了“高祖（刘邦）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的例子，让曹操拥献帝于许昌建立政权，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政治优势，为曹操以后的政治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荀彧所以能够弃袁奔曹，是因为他对袁绍和曹操的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当袁绍写信威胁曹操时，曹操把信给荀彧看，问他：“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荀彧说：“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疆（强），苟非其人，虽疆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这就是说，成败是靠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天生”的，更不能坐享其成。接着，荀彧又全面分析了曹操和袁绍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他指出：“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曹操）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这里荀彧全面论述了政治路线是起决定作用的。他批判了儒家的讲“世资”而赞扬了曹操的“任人唯贤”。虽然他也说了“仁”和“德”这些话，但是他所说的“以仁待人”决不是儒家的“仁义道德”，而是说要讲实效，不为“虚美”。

二、荀彧是主战派，孔融是投降派。

公元198年官渡之战的前夕，曹操和袁绍的对峙局面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就使得曹

操政权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空前激烈起来。投降派孔融散布悲观论调，认为：“绍地广兵彊”，有“智计之士，为之谋”，“尽忠之臣，任其事”，有“勇冠三军，统其兵”，“难克乎”。荀彧立即站出来反驳孔融说：“绍兵虽多而法不整”。并进一步指出，袁绍那些“谋士”“忠臣”“勇将”并没有什么真本领，而且相互之间矛盾重重，有力地回击了孔融的投降论调，鼓励曹操坚决抵抗袁绍。

在公元200年底官渡之战的决定性关头，袁军的箭象雨一样射进曹营，地洞也挖到曹操帐篷下面，又有人在许昌叛乱，曹操有过退兵保许昌的想法。荀彧用刘、项的荥阳、成皋之战说明在决定胜负的关头“先退者势趋”的道理，指出“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划）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以后曹操夜袭鸟巢，歼灭袁绍主力淳于琼，大获全胜。

### 三、荀彧坚决推行了曹操“唯才是举”的法家路线

荀彧自从投奔曹操以后，许昌建都时为尚书令，死时已“参丞相军事”。据《三国志》记载，“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荀彧向曹操推荐的人物中很多是法家；如戏志才、郭嘉、荀攸、杜袭等。曹操认为“诸所进达皆称职”。戏志才、郭嘉都有“负俗之讥”，还有不少人“起自布衣”。如果荀彧是个儒生，他为什么会给曹操推荐这么多有法家思想的人物呢？可见荀彧是崇尚法家的。而孔融就与荀彧不同，推荐了一批象弥衡、边让那样的反动儒生。

### 四、曹操对荀彧的评价

荀彧刚弃袁奔曹，曹操就称荀彧为“吾之子房也”（即辅佐刘邦的张良）。官渡之战后，曹操给汉献帝的奏章中说：“臣自始举义兵，周游征伐，与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他要求封荀彧为“万岁亭侯”。以后又上表封荀彧为三公，荀彧坚决不接受，“至于十数”，曹操才不勉强了。曹操曾经说过：“二荀令（荀彧、荀攸）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曹操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荀彧的长子荀恽。

### 五、关于荀彧所说的“集才通儒”的问题

荀彧出身名士，当然受到儒家思想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只从他的出身来看，也要看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他确实给曹操提过“集才通儒”的主张，但是他的目的是不是真要全面尊儒还值得分析。我们知道，从汉元帝到东汉末期，地主阶级的尊儒势力已统治了三百多年。由于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很多法家代表人物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连曹操本人也说过：“夫定国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三国志·魏书·高柔传》）荀彧提出要“集才通儒”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大一统的曹魏制度，这是合乎地主阶级进步力量掌权后演变的逻辑的。他对于儒学要“去其繁重”，“重新刊定”，可见他并不崇拜董仲舒那套烦琐哲学，他常提汉高祖，从来不提董仲舒。荀彧的主张是和曹操的“刑先礼后”相吻合的，不然的话，曹操也不会“嘉纳之”。同时，荀彧主张“集才通儒”，也说明他没有完全摆脱儒学的影响，他的法家立场还不坚定，但这不是他思想中的主要倾向。

## 六、关于包庇杨彪的问题

荀彧袒护杨彪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他只是说不要拷打，这和孔融亲自跑到曹操那里大吵大闹死保杨彪的顽固态度还是有区别的。

## 七、关于反对曹操“加九锡”的问题

荀彧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制定者。他的反对“加九锡”，一方面说明了他不敢触动东汉皇帝；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能否继续保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因为加九锡并不标志着曹操进一步掌握更大的实权，而当时又是曹、孙、刘鼎立时期。在这以后，夏侯惇虽然对领汉印不满，希望由曹操直接授给魏印，但是，他也劝过曹操暂时不要称帝，等到统一以后再称帝。况且，曹操本人也对加九锡再三推辞，表示犹豫。

## 八、关于荀彧的死

过去，那些攻击曹操的人，都用荀彧的死大做文章，说什么曹操“奸诈”，只因为荀彧反对加九锡就逼他自杀，这完全是《三国演义》的歪曲。实际上，《三国志》的正文说荀彧是自己病死的。裴松之的注释中有两处说荀彧可能自杀：一处是引自《魏氏春秋》，说荀彧因为反对加九锡收到曹操的空食器（盒），因而自杀；另一处引自《献帝春秋》，说他因为没有及时揭露董承的叛变阴谋，过了很多年曹操追问，他服毒自杀。但是裴松之自己对于后一种说法做了批语，认为这是对荀彧的诬蔑。我认为应该以正文为主，因为裴松之的注释是在一百三十余年以后，这时儒生为了诬蔑曹操造了不少谣。

《三国志》原文说，因为荀彧反对加九锡，“太祖由是心不能平。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以待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病薨，时年五十，谥曰敬侯。”这段记载，我认为是符合曹操一生的用人路线的。大家都知道，陈琳为袁绍写檄文骂过曹操，贾诩也反对过曹操，但曹操仍然重用他们，难道只为了“加九锡”这件事就逼荀彧自杀吗？荀彧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任人唯贤，在军事策略上替曹操出了很多好主意，曹操决不会因为他一时的错误就逼他自杀，所以曹操仍让荀彧“参丞相军事”是可信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看他的全部历史活动，尤其要看他在重大路线斗争中的立场，不能只看表面的言论，要看他实际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中曾有不少进步思想家打着儒家旗号进行法家活动。所以对于荀彧也要分析，既要看到他拥护曹操法制的主要方面，也要看到他没有完全摆脱儒家影响的局限性。

由于我自己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历史知识肤浅，所以上述看法也可能不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南开大学哲学系 73 级工农兵学员 韩 强

# 鲁 迅 传

石 一 歌

## 第六章 在大分化中前进(一)

### ——揭露“假洋鬼子”

“六·三”以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浪潮，迅速向纵深发展。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面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一面深入工人农民当中，组织和发动工农革命。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

革命的发展吓坏了大资产阶级。他们仿佛看到一个强大掘墓人紧跟在自己的身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最先预感到本阶级的厄运。胡适自己就说，他实在“看不过、忍不住”了，于是接连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新思潮的意义》一类文章，疯狂攻击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是“阿猫阿狗的事”。同时便提出“一点一滴的改良”的反动实用主义主张，反对对旧中国作“根本改造”，反对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胡适的公开挑战，标志着参加五四运动的资产阶级右翼，在革命深入发展的面前，已经公开站到了反动势力一边。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所组成的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已经分化。

奔腾的历史潮流，就象大浪淘沙，把各种人物的面貌区分得清清楚楚。

——在急剧的分化面前，《新潮》社的主要成员傅斯年、罗家伦，步胡适的后尘，掉转枪口，公开攻击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背叛革命；

——在急剧的分化面前，号称“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一头栽倒在烟榻上抽起鸦片烟来，由颓唐而销声匿迹；

——在急剧的分化面前，曾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过几仗的刘半农和钱玄同，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五四”高潮刚过去，一个开了小差，跑到外国“镀金”，一个钻进了故纸堆，逃离了战斗。

在急剧的分化面前，鲁迅只见同一战线中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落荒，感到一种身

在古战场的寂寞。新的战友在哪里？

但是，虽然寂寞，还要战斗。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他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同时又连续发表了不少《随感录》，继续批判孔孟之道。在不少曾受过青年崇敬的“导师”们背离进步青年而去的时刻，鲁迅为了解放年青一代，决心继续“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宽阔光明的地方”在何处，鲁迅在当时是无法回答的。共产主义理想他还不甚了然。但他总觉得，既然反动派一再反对这种学说，那一定对摧毁旧社会“黑暗的闸门”有效吧？

正在这时，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鲁迅到北京大学去，在大学的出版部收到了陈望道寄来的一封信和他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著作《共产党宣言》。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陈望道在信中说，在五四运动中，他受了鲁迅很大的影响。他特别记得，正当反动当局极端仇视革命学说，把种种新思潮都当作毒蛇的时候，鲁迅却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动当局越是把新思潮当作毒蛇，这种“毒”应该越重越好。鲁迅对革命理论的热情支持给陈望道很深的教育和很大的鼓舞，现在他以崇敬的心情把译本寄给鲁迅，并请鲁迅对译文多加指正。

读完了书，鲁迅兴奋地称赞道：“这个工作做得好！”并且说：“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

不久，鲁迅把重新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寄了一本给陈望道，感谢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

事情是那么明显：资产阶级右翼因害怕和拒绝马列主义背离了革命，而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却随着革命的发展日渐接近了马列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分化的焦点已越来越清楚了。如果说，至此斗争还刚刚拉开序幕，那么，围绕着是不是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围绕着接受还是反对马列主义这个焦点，分化和斗争还必然将日趋激烈。

果然如此。没有多久，这场斗争在《新青年》这块阵地上展开了。

“五四”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播的形势下，《新青年》上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也日益增多。据统计，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新青年》上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关于苏联的研究和中国工人运动的论文及通讯等共有一百三十余篇。这个杂志，已逐步成了共产主义宣传的重要阵地之一。

这种发展，当然是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对立的。已经站到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反面的胡适，又一次“看不过，忍不住”了。不久前，他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妄想一手挡住马克思主义的洪流，现在，他却以《新青年》编辑的身份，在《新青年》内部搞分裂。一九二〇年底，他先写信给陈独秀，要求《新青年》发表“声明”“不谈政治”。接着，又写信给李大钊、鲁迅等人，攻击《新青年》“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即“苏俄”，当时在美国出版的一种进步刊物）的汉译本”，提出要《新青年》“改变内容”，“不谈政治”。胡适甚至扬言，

如果不这样做,《新青年》就必须“停办”。

胡适的信在北京的编辑人员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人来信往,争议不休。有的主张停办,有的主张公开分裂,有的主张改变色彩,也有的反对胡适的主张。他们各以自己的不同语言,表达了各种代表人物对待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发展的不同态度。

接到胡适的信,鲁迅特别警惕。打过几年的交道,鲁迅深知胡适的为人。鲁迅跟朋友说过,如果把胡适比作一个仓库,里面明明放着刀枪剑戟,他偏要在仓库的门上贴上一张纸条,写着“内无武器,请勿疑虑”的字样,使人放松警惕,猝不及防。现在,这封满口“不谈政治”的信里又藏着什么武器呢?

鲁迅对《新青年》发表的文章和作品,做了一个总的分析。它所发表的政治论文和作品,尤其是近来宣传新思潮的作品,大多是长期受压抑的中国人民要说的话,只有反动官场对它才感到头痛。这样的“政治”不谈,岂不是明明向反动当局投降、讨好?鲁迅决不允许胡适的阴谋得逞。于是,他拿起笔来,干脆脆地写了一封短信:

对当局,“不愿示人以弱”。

“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

还不是马列主义者的鲁迅之所以能如此痛恨胡适之流反对谈政治、反对宣传新思潮的行径,是因为他深知他们倒退、复辟的主张会把中国社会引进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因此,就在与胡适等人斗争的同时,鲁迅还发表了好几篇小说,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农村图景,向人们展示了倒退复辟是怎么回事。这些乍看画面较为阴沉的作品,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用新思潮唤起人们觉醒、进行一次新的社会革命的必要。

一九二〇年九月,鲁迅发表了短篇小说《风波》。这篇小说以一九一七年封建顽固派张勋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为背景,指出辛亥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打击封建统治阶级,农民丝毫没有改变原来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农村表面上的风平浪静,“无思无虑”,却隐藏着复辟的危险——

正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一阵政治阴风从北京刮到偏僻的城镇,又由城镇刮到农村:“皇帝坐了龙庭”了。于是,在辛亥革命后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的地主豪绅顿时又活跃起来,他们象作品中的赵七爷那样,放下了象征封建老根的辫子,穿起轻易不穿的宝蓝布长衫,神气活现地东跑西窜。他们时而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威胁,欲置农民于死地;时而两手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向别人刺去,露出了反动复辟狂的凶残面貌。鲁迅通过这个反面典型说明,如果反动阶级没有被摧毁,农民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一有风吹草动,这样的封建顽固势力,便要继续欺骗群众,愚弄群众,实行封建复辟。这不正是现实斗争的一面镜子吗?

一九二一年五月,鲁迅发表了又一篇小说《故乡》。小说描写的是经历过辛亥革命风雨雨后的乡村。但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一幅农村经济日益破败,农民生活日益穷

困的图画。身受封建统治阶级长期压迫和剥削的贫苦农民，革命以后，仍旧受尽了“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苦。小说的主人公闰土，在童年时代原是一个生着紫色的圆脸、颈上套着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手里拿着钢叉的农村“小英雄”。经过长期的折磨，只见他灰黄的脸上布满了很深的皱纹，手裂得象松树皮，头上戴一顶破毡帽，身上只穿着一件极薄的棉衣，因为抵抗不住寒冷，浑身抖索着。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呐呐地说：“非常难……”然后只管默默地吸烟，让痛苦在内心煎熬。这样的“故乡”，不又正是直到“五四”以后中国广大农村的缩影吗？不改革，不前进，怎么行呢？

但是，鲁迅是遵循无产阶级革命前驱的“将令”的，鲁迅也相信“将来”必胜于“现在”，因此在《故乡》的最后又出现了一个颇为乐观的结尾。“我”的眼前展现出了一片美丽的图景，而且认为“希望”虽然还有点“茫远”，但“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种毫不怀疑能以披荆斩棘的努力争取到美好希望的坚定信念，产生于大分化时期，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发表这样的小说，就有力地批判了胡适等资产阶级右翼和各种反动封建势力的停滞、保守乃至倒退、复辟的论调，配合了新的革命高潮的来到。

正当鲁迅在与胡适等人的斗争中呼吁新思潮的到来，在揭露和批判黑暗现实中憧憬着美好希望的时候，中国革命的真正希望终于出现在中国人民的眼前，它是那样辉煌和切实，以至远远超出当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所能预想的范围。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了。

鲁迅当时还没有同中国共产党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伟大的思想家总是善于体现时代的要求，并且在思想文化上反映出当前革命的重大问题，和无产阶级取同一步调。由于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革命政党，它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一点，敏锐的革命者鲁迅已从各个方面有所觉察。在这样的时刻，他感到需要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继续总结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给正在进行的革命提出新的问题。

这种思考和总结所得出的思想成果，已大大超过《药》、《风波》、《故乡》这样的小说所能包含的容量。鲁迅已经迫切地需要通过较大篇幅的作品来系统发表意见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底的一个晚上，《晨报副刊》的一个编辑来看望鲁迅。在谈话中，编辑说，他们的报纸准备开辟一个“开心话”的专栏，希望鲁迅给他们写点东西。鲁迅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答应了，并开始准备。

这已经是严冬的季节。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房间正好朝北，屋前又是通道，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他这时的生活又很不安定，有时在赶着翻译小说，校订



文稿,有时要到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去讲课,来去奔波,简直很少有机会静下来坐一坐,想一想。

但是,就在这种环境下,鲁迅孜孜不倦地创作,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篇空前伟大的小说——《阿Q正传》。

一个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历史事件在未庄展开。未庄,这是中国一个普通的农村。那里有着一大批贫苦的农民,他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靠出卖劳动力维持最低的生活。小说的主要人物流浪雇农阿Q,就过着十分穷困的生活。他没有家,没有土地,一个人住在土谷祠里,靠做短工、长工度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但结果,阿Q除了穿在身上的破夹袄和一条裤子以外,已经一无所有。未庄,还有一批寄生虫、吸血鬼——反动的地主阶级。以赵太爷、钱太爷、地保为代表的豪绅长期统治着贫苦的农民,对他们进行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阿Q因为说了一句他也姓赵的话,就被赵太爷打了一个嘴巴,又被地保敲了二百文酒钱。阿Q因为向女佣吴妈求爱,不仅身上被大竹杠打了几下,扣去了工钱,赔了香和红烛,还要请道士禳灾,费用由阿Q负担,地保又乘机敲去了四百文。一句话,地主豪绅千方百计地要把农民身上的血汗榨取干净。

突然,辛亥革命开始了。革命党进了城,举人老爷、赵太爷、钱太爷都慌了手脚。丁举人逃到乡下避难,赵太爷见了阿Q也喊起“老Q”来;赵白眼对“Q哥”则称起“穷朋友”来了。

革命唤起了农民的翻身激情,就连阿Q那种浑身套上了封建阶级思想枷锁的落后农民,见到未庄“一伙鸟男女”慌张的神情,也激发起了朦胧的革命要求,对革命有些“神往”了。极端贫困的经济地位毕竟要比他历来使用的“精神胜利法”的作用有力得多,现实得多。因此,阿Q不禁大声地嚷道:“造反了!造反了!”表达了长期受着压榨的贫苦农民的革命愿望。

可是,阿Q无论如何没有料到,正当他做着好梦的时候,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早已抛弃了农民。地主豪绅也盘起了辫子,用洋钱买了一块“自由党”的银桃子挂在衣襟上,变成了“革命党”。所以,真正的革命党没有到农村来,倒是由赵太爷和假洋鬼子相约到静修庵去“革”掉一块龙牌,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还未来到未庄就烟消云散了。

阿Q当然很不满足,他也想跑到城里去投奔革命党,但城里也并没有革命党来收容他。那里的情况也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做了民政帮办,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把总。投来投去,阿Q还是碰上了自己的死对头——假洋鬼子。阿Q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我要投……”的时候,假洋鬼子一面扬起“哭丧棒”,一面就吆喝着“滚出去”!不准阿Q“革命”。

阿Q的结局是十分悲惨的。革命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利益,他倒成了这场流产的革命的牺牲品。革命果实既已被地主豪绅、假洋鬼子篡夺了,他们就要反过来镇压人民。于是,阿Q终于被挂着“革命党”牌子的“长衫人物”平白无故地当作强盗拉去枪毙了,至死阿Q

也没有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悲剧，这是多么沉痛的历史教训！

通过《阿Q正传》，鲁迅深刻地揭示出，由于资产阶级跟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动摇封建制度的基础。因此，他们虽然赶走了封建皇帝，作了某些改革，但是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亿万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从而也不能使中国从黑暗的深渊中解放出来。《阿Q正传》正是通过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批判，揭示出了一个历史的结论：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这样一个历史结论的得出，在政治上、思想上有着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

通过《阿Q正传》，鲁迅提出了革命中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是的，未觉悟的农民身上必然会有各种缺点，如阿Q身上的缺点就够多的了，而且好多缺点是必然要成为参加革命的阻力的。是把他们吸引到革命队伍里来，并在革命过程中荡涤掉这些缺点，还是干脆把他们拒之于门外，这对任何一场革命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此，《阿Q正传》的发表也给了新的工农运动以重要的借鉴。

小说所刻划的“假洋鬼子”形象，也有着十分深刻的教育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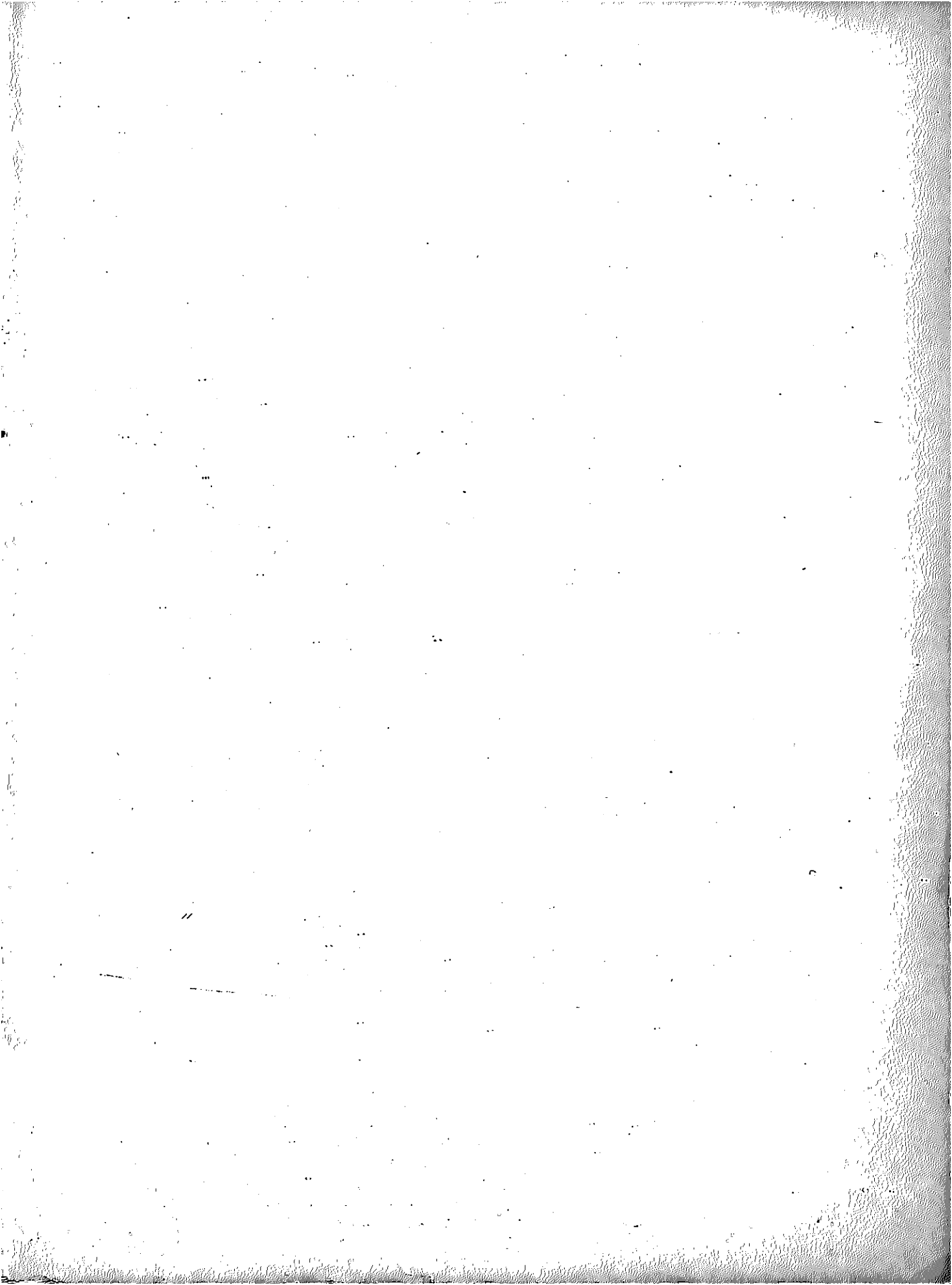
在鲁迅的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这种带有买办性质、从害怕革命到投机革命进而又破坏革命的反面典型，标志着鲁迅对资产阶级右翼破坏革命的危险性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这个典型深刻地概括了买办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通过它，鲁迅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规律：在一切革命运动中，总有一些“假洋鬼子”要混进革命队伍来破坏革命。因此，谨防“假洋鬼子”，便是鲁迅对未来革命的重要忠告。

《阿Q正传》象照妖镜一样照出了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各种人物的原形。“开心话”一点也不开心了。官僚幕客、绅士淑女暴跳如雷，有的骂作者揭了他的疮疤，有的骂作者揭了他的隐私。这表明，他们都在鲁迅的解剖刀面前发抖了！

《阿Q正传》的发表，正迎来了革命的洪流。一九二二年初，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同年九月十四日，安源煤矿一万七千多工人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举行了震撼全国的大罢工，中国工人运动迅速进入高潮。鲁迅所关切的农民运动也蓬勃兴起。历史告诉人们，无论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枪炮和屠刀，还是形形色色的“假洋鬼子”的破坏，都改变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一九二二年底，鲁迅把一九一八年以来创作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十余篇小说编成一本集子，题名《呐喊》。“呐喊”二字，形象地概括了鲁迅在这个时期的战斗风貌。而以此命名的整本小说集，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第一个最丰硕的文学成果，它既成功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又充分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方向。

(续二)



◆  
一 九 七 五 年

◆  
第 六 期

◆  
总 第 二 十 二 期  
◆

XUEXI YU PIPAN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代号· 4-192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定价: 0.25元